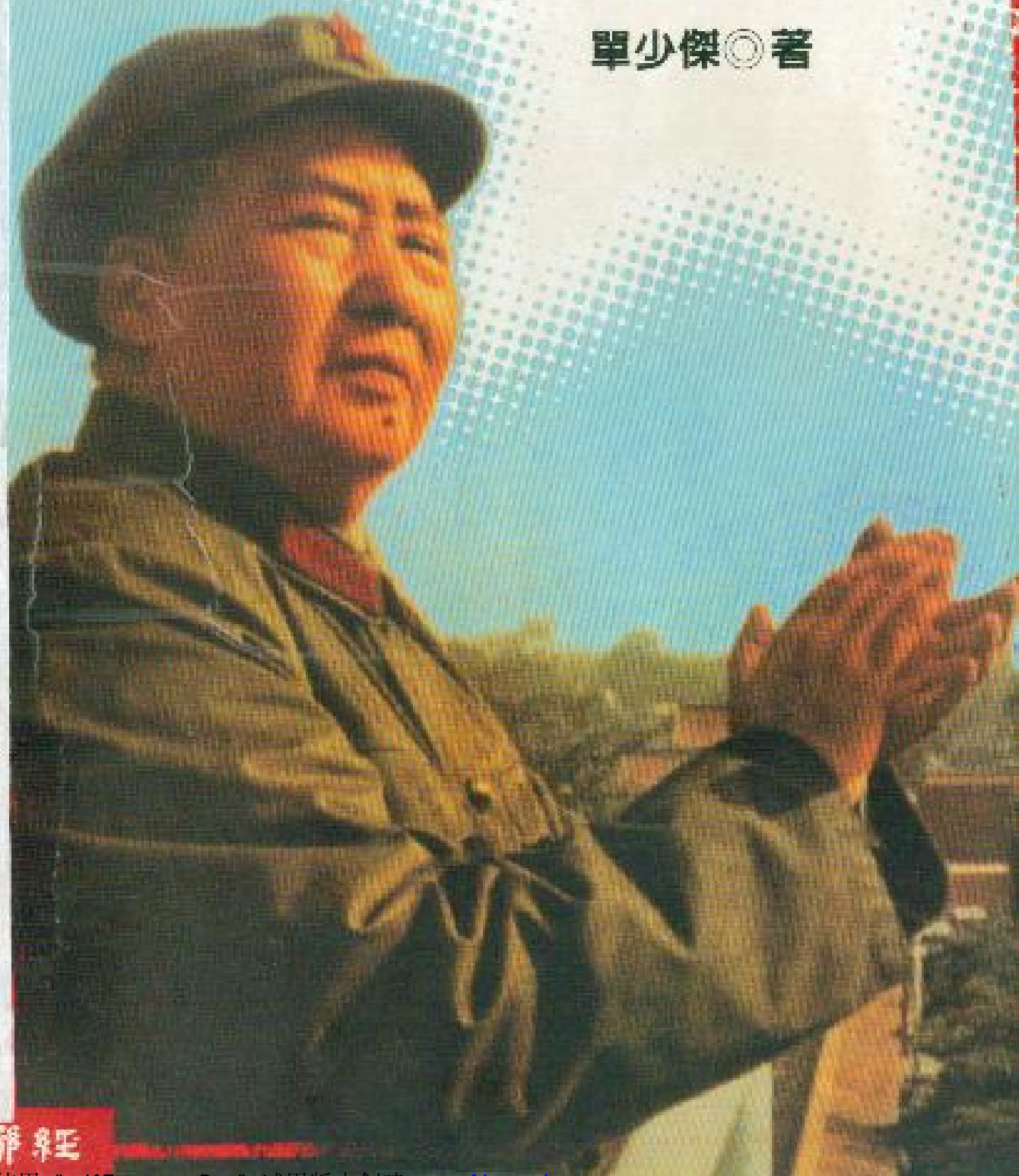


文化叢刊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著



聯經

第三篇

轉折：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

引言

1962年，對於毛澤東治下臣民來說，似乎不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年分，既不是肚子最餓的年分，「黑色六〇年」剛過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亂的年分，「紅色六六年」還得等幾年。

這一年，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分，一個在其執政生涯中堪稱轉折點的年分。隆冬一月，北京開「七千人大會」。老人家低下了頭，認了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¹

金秋九月，北京又開「八屆十中全會」。老人家再次昂起了頭，昂得比過去更高，並作出一副高瞻遠矚的模樣，向人們鄭重地宣布：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少則幾十年多則兩百年），始終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很激烈的」²。

此斷言口氣宏大、言辭激烈，撞鐘擊鼓般地告訴中國老百姓，他們的毛主席現在要去做比搞經濟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事了。

1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4。

2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1962.9.27）〉，《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

28

在這一年中，執政者毛澤東先是低頭退卻，後又昂首進擊，從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變為主要搞階級鬥爭，由竭力做「第一件大事」轉變為竭力做「第二件大事」。

在此之前，面對饑饉遍中國的慘況，老人家項上那顆一向是高高聳起的頭顱已頻頻低垂了，那張總顯得豪情萬般的臉上竟不時透出些愧色來。

在196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反覆談到要恢復實事求是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承認自己近幾年不大了解情況，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從前在江西做的那種調查研究，現在做得少¹。

同年3月13日，他在寫給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信中，先是批評這些人以及各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對於農村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義問題，「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繼而捎帶批評了自己一句：「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²

9月29日，他在寫給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批示中承認，在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定於生產隊還是定於生產大隊這一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³

到了第二年初，老人家把這種自我批評從中央高層內做到「七千人大會」上，正式向全黨認錯，說出了前文所引述的那段話。

¹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72-373。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904。

³ 同前註，頁939-940。

不過，他說出那段認錯話的時間，並非會議之初，而是會議開幕後的第20天。當時，會議按原計畫接近尾聲，但許多與會者反映，他們心中還有些話沒有講完，還些氣沒有出盡，希望會議再強調一下發揚黨內民主和反對官僚主義等問題。政治家毛澤東在獲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與常委們商量，決定延長會期以補議這些問題。

1月29日下午，他宣布會議要接著開下去，開成「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

1月30日下午，他本人作了長篇講話，講民主集中制，講自己也有錯誤、也應承擔責任。他一共談了6個問題：1、此次會議開法；2、民主集中制；3、現階段階級關係；4、認識客觀世界；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6、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他談得較多的是第二個問題和第四個問題。他談前者談出了十個問題，談後者談出了四十年黨史，都力圖回答執政黨近幾年來何以犯錯誤問題。他談前者時說，這是因為執政黨沒有很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沒有充分地發揮黨內民主。他談後者時說，這也是因為執政黨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缺乏這一方面的經驗。

那麼，他所談的這兩個問題與他本人有什麼關係？他有沒有把自己談進去，承認不承認自己既不講民主又缺乏經驗？通觀其講話，他談前者只談別人，談後者才談到了一點自己。

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說⁴：「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麼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上了我們的憲法，他們

4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5。

就是不實行。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裡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裡去幹什麼呢？為什麼不坐到自己房子裡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議論紛紛呢？」

毛澤東在談別人不民主時，也談到了自己，但主要是作為正面例證來談的：「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

他在談有些人犯了錯誤自己不說也不許別人說時，再一次談到了自己：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

隨後便講了那段「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的話。

這裡確有承認錯誤之意，但更有表白自己敢於自我批評且勇於承擔責任的意思。

不講民主，本應是執政者毛澤東難以啓口的痼疾，如今倒成了他滔滔不絕的談資，並獲得陣陣掌聲。

毛承認自己確有錯誤，但只把它歸結為認識問題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又指出這種認識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裡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毛還特別以「民主革命」為例：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1921年黨的建立直到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廿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

在此之前，「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

5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5-9；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0-1031。

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1/10。……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反之，「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在此既講歷史又談哲學，無非是要向他的黨人表明，他們的主席搞社會主義建設犯錯誤是合乎認識發展規律的，是合乎情理的。而那些無論在歷史學識上還是在哲學見識上都遠不及他的聽講者們，自然聽得確信不疑，感動不已。

其中的一位聽講者薄一波在三十年後回顧此事時，仍掩飾不住自己的激動之情：「毛主席這段話講得多好啊！他的態度如此誠懇、謙虛，當時大家聽了，無不深受感動。……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光明磊落的精神。」⁶

顯然，薄某不是在正視毛澤東，而是在仰視他，帶著一種近乎宗教感的領袖情結來看待他，崇敬有餘，說理不足。這也是許多老中共黨人至今仍棄之不去的心理包袱。與之相反，只要抱著客觀態度，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毛所說的這些話有許多漏洞。

例如，他承認周恩來、陳雲等比他更懂經濟，可他又為什麼要強使他們作違心檢查，並越過他們搶到前台來獨斷一切？他承認自己對搞社會主義建設知之不多，可他又為什麼要拒絕別人提意見，甚至把提意見者打成機會主義分子？顯然，這已超越了認識問題，而涉及到政治問題，涉及到執政者如何運作政治權力問題。

又如，他說人們在做那些從未做過的事情時難免要犯錯誤。這種說法過於抽象，回避了一個重要問題：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1。

犯錯誤有一個程度問題，有犯小錯誤者，有犯大錯誤者，甚至有犯特大錯誤者。人們可以說做事難免要犯錯誤，但不能說做事難免要犯大錯誤或特大錯誤。毛澤東以及由他領導的執政黨在這幾年中所犯錯誤正是這後者。

可見，毛用上述話來解釋其錯誤，實是用抽象來混淆具體，用不加以限定的一般常理來掩飾其所犯下的特定錯誤，即那種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錯誤。又如，他說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北伐戰爭與土地革命戰爭兩度失敗，才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這位老黨人在說此話時，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一個重要史實：

中共在這兩度失敗後，不僅獲得了對革命的認識，而且撤掉了一些領導人的職務，至少把他們排除到最高決策圈外。這期間先後被撤職或被降職的中共領導人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秦邦憲、陳紹禹等。重大的失敗必須有重要的人物來承擔重大的責任。這種承擔責任不能以責任者說幾句認錯話來了事，而應使其受到嚴厲懲處，至少被逐出決策圈外，使其不能再貽害本黨。

可是，毛澤東在用本黨搞民主革命的失敗教訓來解釋自己搞社會主義的失敗後果時，只談失敗能夠增進認識的一面，不提失敗應有負主要責任者為此丟官的一面。這種談法顯然是實用主義的，是唯我所用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慣例來行事的話，那麼，毛在1962年初就不只是認錯了，很可能要下台了。這無論對他自己來說，還是對他的黨對他的國家來說，都有好處，至少他執政後所幹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搞不起來。

再如，他說執政黨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故在行動上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幹出「許多蠢事」。這一說法也有難以說清的地方：

毛說此話時，新中國已有十二年歷史了，其間分為前八年(1949-1957)與後四年(1958-1962)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由周恩來、陳雲等人掌管經濟工作，後一階段主要由毛澤東自己掛帥搞「三面紅旗」運動。按理說，前八年經驗要少些，捅的漏子要大些；後四年盲目性則應小些，幹的蠢事也應

少些。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前八年不僅沒有捅大漏子，而且成績斐然；後四年盲目性則更大，幹的蠢事也更多。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很尷尬，不僅有其責任問題，而且與其理論不符：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短反而錯誤很少，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長反倒錯誤很多。顯然，這個問題對老人家來說是回避不了的，必須予以解釋。

毛澤東承認前八年的建設做得比較好，但又指出：「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那麼，後四年的建設又如何呢？他說：「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⁷

簡言之，前八年建設，雖然搞得好，卻是照抄別人的，缺乏創造性；後四年建設，雖然碰釘子，卻是自力更生的，故不免缺乏經驗。

如此辯解，讓人覺著老人家太缺乏風格了，對別人過於苛刻，對自己過於遷就。共產黨家中的理，不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讓他一個人說了。

不幸的是，如此強詞奪理的講話，竟還能贏得滿場的喝彩，贏得全黨七千名縣以上幹部的附和，故預示著這個黨還要犯大錯誤，還要栽大跟斗。

話說回來，毛澤東畢竟在「七千人大會」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認自己應對執政黨失誤負有領導責任，總算低了一下頭。這一低頭意味著他將從經濟戰線上退卻下來。

7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8。

29

對於毛澤東從經濟戰線上的退卻，他的同志們尤其是他身邊的那些中央大員們，將會作出何種反應呢？

這些大員們表現出一種好意與戒心參半的態度來：一方面，爲他遮遮掩掩，好讓其走人了事；另一方面，對他旁敲側擊，以勸其好自爲之。

出於維護毛澤東威信的好意，他們紛紛出來爲其打掩護，使之體面退場。其中，出力較多的幾個人：一是於1940年代被毛確認為第一副手的劉少奇，二是於1950年代被毛提升爲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三是於1960年代被毛指定爲接班人的林彪。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先是代表中央向會議提交一份書面報告以供與會者討論，後又發表講話以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¹。在此報告與此講話中，劉反覆強調，這幾年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與此相應，他列舉了12條成績與4條缺點錯誤，並說如果大家覺得缺點錯誤說得不夠，還可加上一兩條。他還補充道：「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停止，不再犯了，已經改正了，或者正改正。也就是說，缺點和錯誤的大部分已經過去了，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現在這場病基本上已經好了。」

關於這些缺點錯誤的性質，劉一再強調：「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的過程中，在某些時候，發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對於好省注意不夠，或者沒有注意；只注意數量，對於品種、質量注意不夠。」

1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報告〉、〈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49-417、418-443。

另外，劉還特別提到1959年廬山會議，繼續為毛澤東進行辯護，繼續對彭德懷進行詆毀。在書面報告中，他堅持說，彭德懷上書是為達到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廬山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²。

在大會講話中，劉又解釋道，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右傾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於是，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坐於一旁的毛澤東當即作了一個畫龍點睛般的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³。

於是乎，彭德懷為民請命之舉有了漢奸嫌疑，並且這種嫌疑被言之鑿鑿地公佈於這個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幹部會議上。

據《彭德懷傳》的記述，當將軍在後來讀到此話時，臉色徒變，拍案而起，心膽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連聲喊道：「誣蔑！誣蔑！」⁴

劉少奇在此大會上，之所以要提廬山會議、要講這些不實之詞，說到底還是為了維護毛澤東主席的。在毛搞「大躍進」推行「左傾路線」的過程中，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關節點：毛的左傾路線在此之前，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在此之後，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而且表現在政治方面。

毛犯錯誤在此前，還可說是無意所致；在此之後，就無疑是一意孤行、明知故犯。結果這條左傾路線不僅搞垮了經濟，而且打擊了忠良、坑害了百

2 《彭德懷傳》，頁678。這兩段引言，在後來編排的《劉少奇選集》中均被刪去。

這種大肆刪改重要歷史文獻的現象，在現今出版的已故中共領導人的文集中屢見不鮮。如此做法是不負責任的，既不尊重死去的人，也不尊重活著的人，是在有意識地對讀者、對人民進行隱瞞。這一做法也是不聰明的，因為，後人最終能夠看到文章的本來面目，同時能夠看出這些選編者們是如何在那裡裁剪歷史的，並對他們嗤之以鼻。

3 同前註。

4 《彭德懷傳》，頁678-679。

姓，致使幾百萬黨員蒙冤、幾千萬人民被餓死，可謂罪孽深重。

劉少奇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基本正確性」，要維護毛澤東本人的「光輝形象」，就不能從廬山會議結論上後退，就不能不朝彭將軍那已到處是傷的身上再踹一腳。

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央書記處曾向中央常委會提出報告，一方面肯定「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另一方面表示要由他們來為這幾年錯誤承擔責任。鄧本人也在大會上談道：就全國來說，首先由中央負責；就中央來說，則首先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⁵。

雖然「七千人大會」被稱做「出氣會」，即大多數與會者都對這幾年來黨的工作進行了批評，重點批省委；但對於中共這個很強調精神力量的黨來說，不能光「出氣」，還得要「打氣」。臨近大會結束時，總書記鄧小平作報告，強調他的黨仍有「五好」：一是「有好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二是「有好的黨中央，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其他三好分別為「好的骨幹」，「好的傳統、好的作風」，「好的人民」⁶。

至於林彪如何為毛澤東辯護，前文已作論述，指出他大發奇論：一是東拉西扯，說我們雖在物質上損失了，但在精神上收穫了；二是顛倒黑白，說我們之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按毛主席的話去做。對於林這番辯解，毛非但不覺背理，反而大加讚賞，認為比其他人講得好。

關於林講這番話的動機，有論者指出他是在故意製造個人崇拜，以實現個人政治野心⁷。本文以為，林如此說法除藏有他個人心機外，還存有為毛

5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55；

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4、17、18。

6 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98-301。

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11-412。

著想之意，他很想幫他的老首長過這道坎。在歷史上形成的中共高層派系中，林與劉鄧都同屬毛的班底，都受過毛的大力提攜，故而都與毛休戚相關。

毛對林所作辯護的讚賞，就被辯護者方面來說，意味著毛不容異己的政治品性將更趨顯化。就辯護者方面來說，意味著劉少奇與林彪的政治仕途將發生變化：前者已走到盡頭，後者則繼續上升，直至完全占有乃至超過前者曾經達到的位置。

在此番保毛過坎的眾多大員中，自然少不了周恩來總理。四人抬的轎子，已有劉、林、鄧三方，餘下一方便是此公了。在大會最後一天，周登台發言，十分懇切地作出自我批評，承攬責任。另外，在大會分組討論中，以及在會前會後，周還多次作檢討，說「這幾年所犯錯誤，國務院要負主要責任。」⁸

顯然，周恩來這一自責言過其實了。就實際情況看，在「大躍進」之初，他是被毛趕著走的，是在被毛嚴辭批評而不得不做關於「反冒進」違心檢討後起步的；在「大躍進」之中，他也頭腦發熱，講了過頭話，做了過頭事，甚至寫了一本多有虛誇言辭的小冊子《偉大的十年》；在「大躍進」之末，他則殫精竭慮，為毛收拾爛攤子，填窟窿、補漏洞。因此，周對「大躍進」失敗，縱有責任，也不應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自1935年後，就沒有直接反對過毛澤東，而總是支持他，至少是順從他。這種支持和順從常常採取自我批評的形式（參見本書12節）。建國前，在「遵義會議」上，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他站起來通過嚴責自己的方式，為毛重掌軍權投了最有分量的一票；在「延安整風」中，他又以中共資深領導人身分作現身說法，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毛的正確。建國後，搞了「反冒進」，他便檢討自己犯了保守的錯誤，以服從毛的領導；搞了「大躍進」，他又檢討自己犯了激進的錯誤，以維護毛的威信。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27-1028；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4、18。

可以說，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做自我批評做得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人，既勇於做自我批評，又善於做自我批評。他做錯事能夠自我批評，沒做錯事也能夠自我批評。並且，他每次做自我批評，無論做恰如其分的自我批評，還是做誇大其詞的自我批評，都不影響他在黨內的威信，甚至能增進他在黨內的威信。

儘管他的許多黨人都說他嚴於律己，但歷史要說他在嚴於律己的同時過於姑息毛澤東，過於容忍這位老人家為所欲為。毛無論搞「大躍進」還是搞「文化大革命」，都得到過他的支持。這種支持有時是有所保留的，但多數情況是傾其心力的。

總之，面對因毛一意孤行而釀成的經濟浩劫。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黨務幹臣鄧小平說，他所領銜的書記處應對此錯誤負有主要責任。政府首腦周恩來說，他所掌管的國務院應為此錯誤承擔主要責任。軍隊統帥林彪十分乾脆地說，毛主席根本沒有責任。

四個轎夫吆喝著不同號子，但都朝著一個方向用力，都要把已陷於泥淖中的老人家抬起來，結果也真的抬起來了。在眾大員竭力掩護下，毛澤東終能從「大躍進」慘敗中全身而退，中央主席的位子照舊坐著，偉大領袖的形象依然光彩奪目。

30

這些中央大員們在力陳上述不實之辭時，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想為毛作些掩護，一方面又對毛存有疑慮：你捅了那麼大一個漏子，點一下頭就要走人，似乎沒那麼簡單；再說我們好不容易將您抬出一個爛泥坑，不是為了讓您再跌進另一個爛泥坑，弄得大家不能安歇。

這種矛盾態度在劉少奇這位政治局大班身上表現得較為突出。他一方面堅持說這幾年執政黨所犯下的錯誤不是路線性質的，另一方面又對「三面紅旗」持保留態度：「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¹可是，這「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面面都涉及路線問題，都具有路線性質。

在分析三年挫折原因時，他多次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認為主要原因是人為的，並指出這種人為原因突出地表現為一些領導同志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尤其是破壞了黨的民主作風。他向「七千人大會」提供的〈報告〉和他在大會上作出的〈講話〉，都有一一對應三個部分，每個部分都反覆談到民主集中制問題，其中第二部分就直接以此為標題。

據薄一波記述，「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講話時，親自用鉛筆重寫了幾大段話，加進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強調這是幾年來犯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²

誠然，破壞民主集中制的領導人不在少數，中央有，地方也有，中南海有，各部委也有；但最突出者無疑是那位權力最大者，那位今日吆喝這個部

1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26。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7。

明日拍板那個委、此次批評張三大員下次訓斥李四大員的老人家。

可見，劉少奇此番大談民主集中制問題，尤其是大談民主作風問題，不能不觸到毛澤東痛處。如薄一波事後所說的，「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³結果，還沒等到劉少奇要於五年、十年後再來總結經驗時，老人家就在四年後用「我的一張大字報」向他算起「1962年的右傾」這筆帳。

前文提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為維護毛而繼續為「廬山會議」辯護，繼續向彭德懷潑髒水。如果稍微推敲一下劉說的那些話，就不難發現內中隱有深義。

據《彭德懷傳》披露⁴，劉少奇在談到廬山會議時說：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是不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不是因為這封信，那又因為什麼呢？劉少奇接著列出彭德懷兩大罪狀：一是長期以來在黨內搞小集團，二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前為結黨營私，後為裡通外國，皆為中國政治之大忌。

按照劉這一說法，彭在廬山上所犯錯誤，主要不是在那封信上面寫了什麼東西，而是在那封信背後搞了一些名堂。這實際上是在重新解釋廬山會議，是在變相修改廬山會議結論，使之顯得不如以往那麼重要了。

彭將軍在信上寫了什麼呢？概而言之，既對事又對人（參見本書第20節）：對事，是說這幾年來黨的工作出現一系列重大錯誤，已危及到各階級各階層關係，錯誤具有「左傾」性質；對人，是說黨主席毛澤東應為此負主要責任，此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很可懷疑，作風浮躁專斷。彭的這些批評

3 同前註，頁1046。

4 《彭德懷傳》，頁678。

大都涉及執政黨全局性問題。劉卻說彭信所言沒有大錯，甚至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

至於彭在信背後做了什麼，劉給他羅列了上述兩大罪名。可是，這兩者嚴格說來，都不屬執政黨的全局性問題，僅涉及黨中的一小部分人，並限於他們的個人品質問題。

劉少奇這一新解釋可謂「明升暗降」：對彭德懷個人的批判明顯地升溫了，對會議總體意義的評價則暗暗地降低了。

另外，劉的這種捨信而究其他的責難方式，也使得彭案的確信度大為降底。他放著白紙黑字的東西不問，而去追究那些很難找到實據的問題：

說彭「裡通外國」，卻提不出有關證據、證人。毛澤東等能夠予以確定的事情僅僅限於彭德懷於廬山會議前曾訪問過東歐數國。

說彭搞「反黨集團」，卻查不出有關綱領、名錄。廬山會議鬥了數十日，只鬥出一個六人「軍事俱樂部」，其中四人（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還是非軍人。

再者，給彭開罪名開得過重，也會適得其反，使人們很難相信真有此事，並對開罪名者的這種搞法產生懷疑。

如說彭「裡通外國」，可將軍本人「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說」，每與外人交談均有翻譯在場，並記錄在案。真要是以此事的話，早就會被揭出來了。毛手下那些搞「專案」的人，最會幹這種翻箱倒櫃揭人隱私的事了。

就彭的軍事生涯來看，他曾屢屢同外軍作殊死之戰，同日本人打了八年，同美國人打了三年，打得英勇頑強，不屈不撓。即使在自家陣營內也不怯於外人，對紅軍太上皇德國人李德敢於臭罵，對「蘇聯老大哥」不卑不亢，並獲蘇軍敬重。

抗日英烈武士敏將軍生前對人說，「當了幾十年的兵，真正懂得為國報效，是在小東嶺會議（第二戰區東路軍將領會議——引者）上聽到了彭副總司

令的教誨後才認識的。從此，我才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⁵

一個國軍將領，聽了彭副總司令一席話就真正懂得爲國報效，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可是，那些中共大員們，何止是聽過彭老總一席話，哪一個不與彭共事數十年並親眼目睹彭是怎樣爲國奮戰的，結果卻把彭說成是一個搞「裡通外國」的人。兩相比較，足見這後一種人弄虛作假、薄情寡義到何種程度。

又如說彭拉幫結派，可彭在中共高層中屬最不喜歡也最不善於拉拉扯扯的人。無論在延安還是在北京，他都不願在中共大員之間作聯絡感情式的走動，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不拜，孤僻⁶。平日裡，將軍不苟言笑，做事較真，遇有看不慣事，不管牽涉到什麼人都會說出來，甚至臭罵一頓，人頭越熟越不講情面，致使許多中共高幹望而生畏。

1950年代，中南海一名衛士向一位首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可怕。這位首長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說此話的首長，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嚴詞數落彭總品質不良的劉少奇⁷。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重新解釋廬山會議是意味深長的：

一方面，委婉承認彭的信中所言，認爲其間許多內容是符合事實的，從而間接地肯定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事實上，也無法不作此表示，因爲彭在「萬言書」上所寫的話，除了「毛澤東」這三個字外，其他的話包括像「左的傾向」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都被與會者們以不同方式說到，並被說得更

5 李國慶，〈粉碎日軍九路圍攻晉東始末〉，《山西文史資料》，1986年第2輯，頁27-39；《彭德懷傳》，頁183。

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34。

7 石國瑞等，〈在少奇同志周圍——警衛人員的回憶〉，《紅旗飄飄》，第20輯（中國青年社，1980年），頁243-244。

具體更生動)；

另一方面而言，加重責難彭的個人品質，幾乎把他說成是一個「亂臣賊子」，結果淡化了廬山會議的路線鬥爭意義，同時凸顯了這一會議的政治傾軋性質。

顯然，劉少奇這種解釋既不能為那位剛性有餘而柔性不足的彭將軍接受，也不能讓那位正坐於一旁而悶頭聽講的老人家感到好受，如其夫人江青後來所言：「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⁸

8 廖蓋隆，《黨史探索》(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頁140。

31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大常委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及前述為毛抬轎子四人外，還有兩位重臣也就「大躍進」問題發了言。一是排名第四的朱德委員長，二是排名第五的陳雲副總理。不過，兩人發言都沒發在七千人均出席的全體會議上，而是發在小範圍的分省會議上。兩人發言都發得更為坦率直露。

2月3日，朱德出席山東組會議並作了講話。他講的中心話題就是反「左」，疾言「那一套『左』的歪風要痛改。」他的這一講話紀要，後來被冠以〈糾正「左」的偏向，恢復和發展生產〉篇名而收入其選集中¹。

他說：執政黨反「左」是十分困難的，「『左』的傾向來了，也帶群眾性，制止不住，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住。有那麼一些人，在『反右』中總覺得高指標都對，不搞高指標就『右』了。所以，風刹不住。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我們黨內比較容易識別，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說：「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誰搞「左」的東西能夠做到「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其談鋒所指已十分明了。朱將軍這番批評可以說是在重述他的老戰友彭德懷曾於廬山說過的話，也是他的老政委毛澤東當年最感刺痛的話（參見本書第19節），並也是後者此時最感隱痛的話。

他指出：「自己犯了錯誤，怕人家揭穿，就壓制群眾，哪個還敢講話呀？」

1 朱德，〈糾正「左」的偏向，恢復和發展生產〉，《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87-391。

「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黨內鬥爭有時同對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

他還滿懷深情地談到老紅軍講團結、講友愛的傳統，談到：「對群眾我們起碼要團結90%以上，對幹部就不是團結90%，而是要爭取團結100%。培養一個幹部，要十年、幾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終是個好幹部。」將軍所言使人很容易想到他的那位老紅軍戰友，那位曾經被黨培養幾十年而如今不再被黨團結的老幹部。

據李銳記述，當年朱將軍在廬山會議上，曾為彭德懷說過公道話；即使被裹脅著參與批彭鬥爭，也是避重就輕，以致被毛澤東譏為「隔靴搔癢」²。此次他在山東組會議上大發批評，雖未指名道姓，但肯定不是「隔靴搔癢」。

毛澤東曾請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後者則以自己還未摸清問題為由而推辭不講。可是，就在大會閉幕後第二天，他跑到陝西省全體來京幹部會議上，講了許許多多話³。

陳一向被譽為「黨內理財能手」，「國家經濟總管」，但在此會上不講他的財政經濟問題，而大談黨的思想作風問題：

「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

陳雲認為這幾年黨風問題突出表現為不說真話，尤其不說作為反面意見的真話，不是因為人們沒有話說，而是因為人們不敢說話，其主要責任在領導身上：

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80-181、191-192、204、226、258、283-284。

3 陳雲，〈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87-190。

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於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

陳雲這一批評，雖未特指某個人，似是泛指整個幹部群體；但肯定涉及毛澤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他說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在一個地區如在陝西省盛行不講真話風氣，那麼主要責任在該省領導身上；如果在全黨乃至在全國大行不講真話風氣，那麼主要責任就不在地方領導身上，而在中央領導身上，尤其在那位中央最高領導身上。在中共高層裡，陳雲是一個講話歷來不多但每講都很用心的人。

陳雲十分了解他的那位上司在頭腦發熱時，非但聽不進來自基層的真話，而且聽不進來自高層的真話。他也十分清楚彭德懷在廬山上說的都是真話，其中有許多話本來就是他陳雲想說而未說出來的。

據有關文獻記述⁴，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期間，彭德懷與陳雲同住在瑞金二路五號，同席進餐，一起散步，交談過許多問題，對「大躍進」中的高指標等問題有較一致的看法。3個月後，彭上了廬山便急衝衝地說出他想說的話，話中自是包括他先前與陳交換過的看法。

人們在讀到彭信全文時可能會問：這位把大部分時間用來統管數百萬軍隊的猛將軍，何以能夠寫出這種事關經濟卻頭頭是道且一針見血的東西來？這除了他本人擁有一顆體恤民情民苦的熱心和掌握一些調查材料外，是否還有高人指點？

今天回過頭去看，這高人至少有兩位：一是在廬山與將軍常常見面的張聞天，二是在上海與將軍頻頻交談的陳雲。前者屬中共黨內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頂尖高手，後者屬中共黨內從事經濟實際工作的頂尖高手。並且，兩者

4 《彭德懷傳》，頁589；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24-125。

都熟知黨的歷史，都熟知毛的為人。因此可以說彭的意見書，就其提出方式而言，完全屬彭個人行爲；但就其所寫內容而言，不全屬彭個人私見，其中許多看法屬黨中同仁共識。

張上了山則與彭同難，陳未上山故與彭案牽涉不多。不過，後者即便上山，也未必會說出彭所說出的那些話，至少不會說得像彭所說得那樣坦露無遺。陳多少還有些忌憚老人家，但這不意味著他會就此罷休，會對彭代己進言而受過這件事完全緘默不語。

當1962年毛澤東作經濟退卻時，他陳雲在「七千人大會」後，跑到陝西來京幹部會上大談黨內民主問題，大批不講真話風氣。

又當1978年毛澤東作古兩年後，他陳雲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預備會上，第一個站起來爲已蒙冤十九年的彭德懷鳴冤叫屈，呼籲爲其平反昭雪，終獲成功。當年年底，中共中央爲彭將軍補開追悼會以恢復名譽。

對於毛澤東容不得批評這一領導作風，陳雲不僅能從他人的遭遇上觀察到，更是能從自身的經歷中感受到。前述他對此公的那番間接批評，實是出自他對後者的直接了解。

在中共高層大員中，陳雲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他能看出許多問題，也想說出這些問題，雖不能像彭大將軍那樣無所顧忌地說話，但總在尋找機會或等待機會說話，並盡量使說話不過於尖銳以致刺痛那位主席大人。這就使得他與毛關係十分微妙：

一方面，毛承認陳能夠看出許多問題的癥結，並能開出相應的藥方，稱之為「良將」、「賢妻」，以致心頭一熱便委以重任，讓其挑擔子；

另一方面，毛又不能容忍陳真的要來糾正他所犯的錯誤，故常反悔說氣話，致使後者心有餘悸，檢討不迭，最後也就撂挑子，打道回府養病去了。

薄一波曾指出：「每當經濟建設遇到挫折的關鍵時刻，總要請他出來，組成中央財經小組，由他主持來解決問題。當時，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這種做法喻之為『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然而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和謹慎細緻的工作方法，同當時『左』的急於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這就形成了財經小組完成了解決問題的任務後，又不被重視，中止工作，問題來了又恢復，這樣幾起幾落的情況。」¹

正如薄所言，陳對毛搞經濟建設所犯的每一個重大錯誤，都有所發現，並都試圖以某種方式予以指正，也都因此受到毛的斥責。不過，陳雲與彭德懷不同：彭往往揪著毛的錯誤不放，非要論出個是非來不可，即便被整治了也不服氣，一有機會就寫申訴材料，以反駁種種強加於他的罪名，結果越發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53-1054。

不容於毛；陳只要毛一批評就主動走人，以脫離接觸，故而使他與毛的矛盾從未激化到毛要致他於絕境的地步。

1955年，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保守思想」，從生產關係變革上一直批到經濟建設速度上，結果引發了一個「冒進」狂潮。

1956年初，周恩來與陳雲等人聯袂「反冒進」，又是發社論，又是砍計畫，一度遏制住經濟過速增長的勢頭。陳雲在此期間強調：寧願慢一點，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²。

1957年秋，毛澤東開始「反反冒進」，大會小會批右傾。甚至在會上搖著柯慶施文章指名道姓地譏諷周恩來，到會下又說他那樣做實際上是針對陳雲的³。在此情勢下，周與陳等只得低頭挨罵，連連檢討，一直檢討到八大二次會議上才告一段落。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1957年實際產鋼535萬噸基礎上，計畫1958年產鋼1,070萬噸、1959年產鋼2,700-3,000萬噸。計畫增長幅度均在3位數以上，大大超過實際可能，致使毛自己都懷疑起來。當年11月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遂把1959年產鋼指標由2,700-3,000萬噸降到2,141萬噸（仍是1958年指標的200%），隨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又把這一指標降為1,800-2,000萬噸。

據薄一波記述⁴，1959年初，毛澤東找陳雲等人談經濟工作。陳列出諸多困難，認為1959年度計畫難以完成。有人不贊同陳的意見，認為是右傾。毛傾向於陳的意見，有心降低指標，故要他向下面講話。可是，陳雲沒有理解毛的意思，以為毛又要他作檢討，於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先講自己真實想法，後作自我批評，認認真真檢討了一番。

2 同前註，頁555-556。

3 同前註，頁639。

4 同前註，頁828。

另據李銳記述⁵，陳雲此番舉動又把毛澤東弄糊塗了。毛說他本是贊同陳的，但不知陳後來爲什麼要檢討自己。

筆者在讀到這些當事人記述時，也很納悶：不知是陳把毛弄糊塗了，還是毛把陳弄糊塗了。不知陳雲是不是在想：你老毛一貫正確，又總愛讓不贊成你意見的人做檢查，我這不剛剛才因反您的冒進而做了檢查；你如今讓我來談你已允准的事，我又很想談一些不同意見，故很可能要再做檢查；與其遲做，不如早做，或許能主動些。

後來澄清誤會，毛正式授權陳雲去實事求是地審訂1959年鋼產指標，該是什麼就是什麼。後者在做了調查研究後，手起刀落，一下砍去數百萬噸，把指標由1,800-2,000萬噸砍爲1,300萬噸。

不過，就陳雲不摸底便檢討這件事來看，很能說明一些問題：一是說明此時中共高層間關係已十分不平等、不正常了；二是說明陳雲對毛澤東批他「反冒進」心有餘悸，對毛存有一種畏之如虎、隨時準備向其低頭認錯的心態，以致無所適從、不得要領。

平心而論，陳雲在中共高層裡屬於愛說實話的人，此次也正因爲想說實話而難爲了自己：既想說實話，又怕毛責怪；權衡再三，只好先說實話，後作檢查。結果毛卻說這檢查多此一舉，讓他好不明白，同時也讓他好不難看。

不知毛是真的不明白還是裝作不明白。他理應清楚在其殿前行走的諸大員中，除彭德懷將軍外，大都很懼怕他，大都唯其馬首是瞻，他對了說他對，他錯了也說他對。

人們很難理解像陳雲這種素來愛說實話的老黨人，到了毛的面前竟表現得如此不講原則；或很難理解像陳雲這樣一向頭腦清楚的明白人，到了毛的面前竟把話說得如此前顛後倒。連陳雲都如此，至於其他大員就可想而知了。從這裡可看出，毛在自己身邊已很難聽到他不愛聽到的真話，相反倒很容易召集起一支圍攻彭德懷的隊伍。

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80-81。

陳雲曾以自己還沒有考慮好爲由而拒絕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成爲「七大常委」中唯一沒有在此會上講話的人。但在筆者看來，陳雲很可能是這七人中考慮最成熟的人。他十分了解國家經濟實況，也十分了解毛澤東爲人，很想說真話，又不想得罪老人家，於是採取了大會上不說大會後再說的策略。

陳雲除了在大會後舉行的陝西幹部會上大談黨風問題外，又在此後舉行的「紅樓會議」（3月21日-23日）上，分析了嚴峻的經濟形勢，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深獲劉少奇等人的讚賞；接著又在國務院擴大會議（3月26日）上，作同一主題報告，贏得國務院各部委領導成員長時間熱烈掌聲。許多與會者說，很久沒有聽到這樣實事求是的報告了。

由於眾望所歸，陳雲於「紅樓會議」後再次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領銜總管全國經濟工作。

這是他第三次出任此項工作。1957年1月10日，他出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爲時不長，便悄然去職。1958年6月10日，他又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當時毛親自跑到前台抓經濟而被晾於一旁，其中有一段時間被毛起用來落實鋼鐵指標，隨後又因廬山會議開展「反右傾」鬥爭而再受冷落，直至整個中央財經小組被撤銷。他此次被起用已是「三起」，不久又要「三落」了。

從1962年春起，中央採取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如下調工業生產指標、減少城鎮人口、抑制通貨膨脹、搞好市場供應以保證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盡一切可能來促進農業增產，從而迅速改變了局面，使得已經趨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出現轉機，轉而趨於恢復。這些措施用薄一波的話說，「基本上就是陳雲同志在西樓會議和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的那些。」⁶

然而，陳雲所作的這些努力，到頭來不僅沒有獲得毛澤東讚賞，反而受其批評，被其指責爲刮「黑暗風」、「單幹風」。

⁶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58-1066。

其一，在形勢判斷上的分歧。

1961年9月，毛談了當時形勢：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當年年底，他又說：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前幾年有點灰溜溜的，心情不那麼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興些了⁷。

隨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附和毛的看法，作出斷言：「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⁸

可是，陳雲不同意毛的看法。但是，也沒在「七千人大會」上把問題挑明，只是到了「紅樓會議」上才大談形勢的嚴重性。他指出⁹，全國人民還在餓肚子，吃穿用都不夠；可是國家基建規模仍是過大，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災荒時候負擔不了，正常年景也維持不了；赤字嚴重，通貨膨脹，市場萎縮。他得出結論：現在已談不上發展了，只能談恢復，這種恢復需要三至五年，其中糧食生產用五年時間都不一定能恢復到以往最高水平。他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同志們，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裡失掉。」話中透出一種似是到了最後關頭的危機感。

陳雲這些看法無疑影響了其他中央大員。劉少奇在陳雲講話後談到剛剛結束的由他作主報告的「七千人大會」，說此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¹⁰ 為此，他修改了自己在那次會議上所作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的結論，承認「在城市

7 同前註，頁1073。

8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59。

9 陳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陳雲文選》，第3卷，頁191-206、207-215。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51-1052。

裡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並指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他在談到1962年經濟調整計畫時，不無感慨地說：「搞了這麼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¹¹

周恩來也承認，在這兩年來的調整中，「我們總是對困難估計不夠，總是希望好一點、好得快一點」；但現在看來，要爭取快，準備慢，如陳雲說的那樣。至於有多慢，周比陳說得更明確：「調整時期要成爲一個階段，主要的內容就是恢復」；「一般設想，第三個五年計畫時期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甚至於還不夠」；其中糧食生產恢復，需要三至五年時間，至於農業全面恢復(包括農、林、牧、副、漁、)，則要超過五年¹²。

毛澤東不同意陳雲等人的看法，但當時未表明自己的態度，照發、照轉諸大員提請批覆的各有關報告，只是到了數月後才開始和這些大員們過不去，三番五次地指責他們大刮「黑暗風」¹³：

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

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

農業恢復要五年、八年，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今後五年不

11 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44-449。

12 周恩來，〈認清形勢，掌握主動〉，《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03-411。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74-1077。

只是恢復，一定要有所發展。

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

本來諸大員幫助毛收拾爛攤子，是為國家考慮，為百姓考慮，也是為他這個主要責任者考慮。結果毛不說感謝的話，反說這些人存心壓他，並一壓就是好幾年。言辭之間個人意氣凸顯，聽不得反面意見且好記仇的老毛病又犯了。

誠然，說執政黨犯了嚴重錯誤自然含有壓執政黨主席之意，但問題是：這個主席領著全國人民搞「三面紅旗」運動，搞得禍國殃民；結果他只在「七千人大會」上稍稍低了一下頭，而在會前會後竟覺著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像人們說得那樣「黑暗」，又把頭翹得很高；因此，於情於理都應該壓他一下。

並且，諸大員對毛的批評或曰「壓」，一般都是躲躲閃閃的，生怕硬碰硬地衝撞他，故已是相當客氣了（也不敢不客氣）。換作彭德懷將軍，假如他還有許多知曉權和許多發言權的話，那麼，他就很可能會為老百姓而和毛過不去，讓毛下不了「七千人大會」的台。

據薄一波記述¹⁴，當時也有人對陳雲「西樓會議講話」不以為然，認為陳這種會上推辭不講會後「大講一通」的做法是「不正常」的。薄說，他與少奇、恩來、小平都不同意這種看法。

不過，後人也會對薄公等人的看法不以為然：當時黨內最清醒的人居然不在當時黨的最重大的會議上說話，能說正常嗎？一個曾經諄諄教導幹部要堅持原則勇說實話的老組織部長如今也在那裡待機而言，能說正常嗎？

問題關鍵不在於這是否「不正常」，而在於這「不正常」是因何而起的。

14 同前註，頁1069。

答案不難作出：這種講話方式上的不正常主要是由執政黨風氣上的不正常造成的。

可以設想，如果陳雲真的在會上「大講一通」的話，後果將不難預測：毛重則要狠狠地整治他，即席剝奪他的發言權，就像對待彭德懷那樣，輕則要牢牢地記恨他，過些日子再來收拾他，就像對待劉少奇那樣。不過，陳雲既不是彭德懷，也不是劉少奇；不僅熟知國家的經濟形勢，而且深知毛公的執政作風；故而暫避風頭，會上不講，會後再講。

其二，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分歧。

當時，陳雲並不是搞「包產到戶」的主角（此主角從基層方面說是千百萬中國農民，從高層方面說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但無疑是支持這一搞法的級別最高的中央大員，是能夠直接向毛澤東主席據實稟報和據理進言的人，故不可避免要與後者發生矛盾。

毛澤東執政後熱衷搞農村生產關係變革，搞「窮過渡」，僅用幾年時間就領著仍是十分貧困的中國農民上了幾個大台階：由互助組到合作社，由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可是，這種生產關係變革不適合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僅沒有給農民帶來切實好處，反而使他們蒙受巨大損失，流失了數以千億計的財富，喪失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

因此，許多中國農民實在是不想走這一集體化道路，而總想自家種自家的地，自家搞自家的勤勞致富。他們一遇有機會就分田單幹，接二連三地搞出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

1957年，高級社成立不久，許多農民就反其道而搞起「包產到戶」，但很快就被執政黨通過發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大辯論」而給制止住，來的快，去的也快。

1959年夏，「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起來不到一年時間，又有許多農民搞起「包產到戶」，並得到執政黨內一些領導幹部支持。如河南省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和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慧智，都贊成包工包產、責任到人到戶。不久，「廬山會議」掀起「反右傾」鬥爭，也把農民這一搞法給反掉了，

指責它是農村中「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¹⁵

1961年春，「三面紅旗」運動已把中國農村經濟搞得奄奄一息、搞得餓殍遍地。中國農民情急之下又搞起「包產到戶」或「責任田」。與前兩次相比，此次搞的時間較長，歷時兩年左右；搞的規模也較大，涉及各個地區，估計當時全國約20%的社隊（安徽省約80%的社隊）實行了「包產到戶」¹⁶；搞出的執政黨反響也更強烈，從地縣到省市到中央，都有許多領導幹部站出來替農民說話。

1961年中，毛澤東對農民為自救而搞起的「包產到戶」未予明確否定，同意試驗一下。這是他鑒於當時農村經濟形勢極為惡化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種讓步。

到了年底，他開始變卦了，召來自己曾當面向其許諾可試搞「責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農村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後者提出，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轉年年初，他就在「七千人大會」上斷然否定這一搞法，把它上升到錯誤路線高度，並為此撤掉曾希聖的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曾書記當屬他那個年代裡的黑色幽默人物，執政安徽期間，先是跟著毛大刮「共產風」，餓死數百萬人，後又逆著毛大搞「責任田」，拔了全國的頭籌，卻丟了自己封疆大吏的頂戴。人稱：「左」也數他，「右」也數他，結果左右都不容他。

不過，事情並不因毛發話而就此結束。當時不論在基層還是在高層，都有許多持相反意見者。

基層中的農民，尤其是「剛剛嘗到甜頭」的安徽農民，強烈要求不要再改「責任田」了，至少三年不改。

15 〈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冊，頁159。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78。

高層裡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以及毛自己的秘書田家英等一批要人，通過調查研究，得出與老人家不同的結論，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搞「包產到戶」或「責任田」，不僅沒有大錯，反而很是合理。他們將自己的調查材料和研究結論上報中央，敦請從實際出發，改弦更張。

據薄一波記述¹⁷，當時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認為此事可議論一下，同在北京的鄧小平也表示贊成，並引用劉伯承將軍常愛說的一句四川老話：「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遠在南方的陳雲也讀了有關材料，認為此舉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並準備向毛澤東進言，向這位不經其點頭就辦不成此事的黨老大討個恩准。

陳雲回到北京，就與幾位在京常委交換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見，便向毛澤東寫了一封求見信：「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毛澤東似也看重這位他曾呼之「良將」、「賢妻」的黨中要人，回到北京當夜就召之談話。不過，兩人談話結果不好。在陳說時，毛不置可否；當陳走後，毛怒氣沖沖地批示道：分田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

另外，李志綏大夫還記述了毛批文中對陳的另一段評價：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¹⁸。字裡行間透出一種厭惡之情，不止憎恨，更有輕蔑，竟把黨中大幹部還以商場小伙計的面目，實為潑罵。

陳雲聞訊後，沉默不語，隨即向中央請了一個沒有截止期的病假，從此就不在毛身旁走動了，故也就不在毛繼續導演下去的一出出劇目中擔任重要角色了。在此後十幾年裡，陳淡出了中國政治，中國政治似也忘記了他，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把他大張旗鼓地「挖」出來。

不過，陳之所以能夠順利地脫離與毛接觸，主要不是因為他請了病假得

17 同前註，頁1083-1086。

1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年），頁378。

到「紅十字」性照顧，而是因為他留下了話：

7月24日〈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我已看過，我完全同意中央作這樣一個決定¹⁹。

陳的這句話換個方式說就是：「我完全同意中央作出的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完全同意中央對我關於分田單幹主張的完全否定。可見，陳是在向毛表了無條件認錯態度後而向其請假的；毛也是因陳這麼快就掛起免戰牌——不像彭德懷那樣冥頑不化——而讓其走人的。」

1965年6月18日，陳雲又上書毛澤東，再次檢討自己：

1962年7月初，我曾經向你提出，同時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幾位同志談過，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產量。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它關係到農業方向集體經濟與小個體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現在用加強集體經濟的辦法，三年就恢復了農業，如果用分田的辦法，可以想是資本主義會大發展，後患不堪設想。思想根源，在於沒有把人與物的關係搞準，沒有人的因素第一這種思想。這是右傾錯誤。

叢進先生引述這一材料後評論道：「陳雲的自我批評，交了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一筆『帳』，免除了一場可能降臨的災難。」²⁰

縱觀建國後陳雲與毛澤東關係：陳屢屢說實話，從而屢屢受毛冷遇，但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86。

2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80-581

也從未被毛徹底打倒過；陳最終活到毛之後，故能糾正毛生前犯下的許多錯誤，但也從未將毛徹底否定過。

33

「七千人大會」開後不久，毛澤東便遭遇了一系列事情：

陳雲在大講經濟形勢的嚴重性，並帶著其他大員一起講，講農業凋蔽、工業萎縮、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鄧子恢在大講包產到戶的優越性，一直講到中央常委圈中，講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還不如農民的「小私有小自由」好；

鄧小平在大抓甄別平反工作，一下子平反了數百萬人案，致使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的成果所剩無幾。

那位倔脾氣的彭德懷又不甘受辱，再度上書，洋洋八萬言，有理有據，把自廬山會議以來強加於他的種種罪名都否定了。

這些事情，樁樁都不合毛意，都似是衝著他來的，都使他感到在「壓我」。老人家有些坐不住了，有些心堵氣悶了。執政黨也將因此而要風雲驟起了。

一般說來，毛若想排遣心中怨氣，就要開會，開那種由自己坐於高台之上教誨張三訓斥李四的中央會議。

毛是一個很愛開會的人，甚至可說是一個「會迷」。他開起會來用嘴巴更甚於用耳朵，因為他有著政務長官和精神導師的雙重身分，有著完全不受限制的發言權，既可以就事論事地評說下屬的工作得失，又可以上綱上線地斷說下屬的思想是非。他開會發言還不同於唱獨角戲，還總有著一幫子抬轎子吹喇叭的角兒環侍身旁，故總能夠贏得一片喝采聲。可以說，他幾乎每次開會都能開出個意氣風發的境界，只是開「七千人大會」有點例外，竟開出一些蒙混過關的味道。

此次毛想排遣胸中自「七千人大會」以來不斷瘀結的政治怨氣，也要開會，結果一連開了三個會，歷時兩個多月：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8月24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會議(9月24日-9月27日)。

在這些會議中，毛澤東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批「三風」，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就是講政治，講階級鬥爭，並提出一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批「黑暗風」的重點是批陳雲。

毛指責陳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使人喪失前途(參見本書第32節)；另外，還嚴辭批評陳所分管的財經工作：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

「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¹

毛這一批評，與他數年前指責「反冒進」者對他搞「封鎖」、不讓他參與經濟工作「設計」那一批評(參見本書第16節)，是很相似的，即又指責陳雲等人犯了做臣子的大忌。

陳雲屢屢為毛分憂，擔當大任，卻又屢屢為毛猜忌，落荒退場。他的這一進退表明他的那位上司已不能知人善任了，用中國老話來說已缺乏做「人主」的才具了，其身旁已呈君子凋零而小人蜂起狀。

批「單幹風」的重點是批鄧子恢。

鄧子恢是中共農村工作元老。第一次國共戰爭時期，他從事過中央蘇區的農村工作，提出過「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屬於毛澤東的「山溝溝裡的馬克主義」一派。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他主持過中共五大野戰軍中的三大野戰軍的後方工作，先是三野，繼是二野，後是四野；經略過黃河以南和潼關以東的廣大地區的農村工作，搞土改，抓支前，籌集糧食，調派

¹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8.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36。

民工。建國後，他又長期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具體指導全國的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以及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村經濟恢復工作。

雖然毛澤東與鄧子恢同為中共農村工作元老，甚至前者比後者更老些；但前者由於位居高位且又愛想入非非，故而不如後者更了解農村實情、更能拿出具體辦法。

毛澤東搞人民公社不講章法，搞得「五風」肆虐，搞得農村經濟一片混亂。就在他一愁莫展之際，鄧子恢通過調查研究擬出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用以規範公社經濟行為。這個條例也就是後來頒行全國的〈農村工作六十條〉的原版本。當時毛也承認：鄧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莊、蘇南做了一次調查，做得很好。他的觀點很正確。這幾年農村工作的錯誤，沒有他的分。他的很多意見是正確的²。

鄧子恢沒有滿足於這一表揚，沒有停留在這種修修補補工作上，而是通過進一步調查研究，提出更為實際也是更為尖銳的看法。1962年7月11日，他在中央高級黨校談出這樣一些觀點³：

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大部分沒有搞好；社員生產積極性不高，是相當普遍的；可以說大部分幹部不與群眾聯繫，有的幹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貪污浪費，過去老百姓養一個保長，現在養許多保長，過去十戶養一個「鞭子」，現在兩戶、五戶養一個「鞭子」；這是因為，在所有制上變來變去不固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在生產管理上沒有建立責任制度；我們有些同志過分強調了不斷革命論，忘掉了革命發展階段論，怎麼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因此，要固定所有制，反對平均主義，允許農民搞些小自由、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912-913。

3 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06-114。

小私有，尤其是要建立生產責任制；農活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是很難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農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產到戶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樣，沒有區別。沒有包產到戶的自留地搞得特別好。因為包產到戶了超產是他的，責任心強，肥料也多。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雖然沒有統一搞，但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

鄧子恢這些說法是相當大膽的，尤其後面一段話公然為「包產到戶」評功擺好，公然衝擊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都不曾後退的防線，顯然已超過了毛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中共高層內，鄧子恢也是一個少有的不大輕易向毛澤東讓步的大員。他對毛敢於直言，甚至敢於頂撞。在1955年合作化運動中，他就數度與毛面對面爭執，氣得後者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砲轟」⁴。

此次在毛已表明不贊成「包產到戶」態度後，鄧又是爭辯不已，氣得毛事後耿耿於懷：鄧子恢同志曾當面和我談過保薦責任田，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⁵。

不過，訓毛澤東是要犯「錯誤」的。

1955年，鄧子恢因此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被嘲諷為「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1962年，鄧子恢又因此犯了「刮單幹風」的錯誤，並被新帳老帳一起算。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345。

5 同前註，頁1088-1089。

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主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⁶。

批「翻案風」的重點是批彭德懷。

關於彭德懷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誰是誰非問題，事實已作出結論。毛澤東心裡明白這一點，否則他就不會在私下裡向彭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劉少奇心裡更明白這一點，否則他也不會「七千人大會」上向全黨中高級幹部承認彭信中說的話「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

然而，毛劉等人不願公開承認這個結論，也不願公正對待彭德懷。這裡既有出於維護執政黨領袖的崇高威信的考慮，也有出於忌憚彭德懷將軍的剛烈品性的考慮。他們很清楚像彭這樣的人，只要有機會說話，就會把他看到的不實之事或聽到的不實之詞說穿開來，而在這幾年中又有哪位中央大員沒幹過不實之事，沒講過不實之詞？

這就有了矛盾：一方面，毛劉等人要維持廬山會議所作出的結論；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無視客觀事實已作出的結論。爲了緩解這一矛盾，他們採取這樣一個辦法，就是盡量不在那些能夠很快加以驗證的問題上做文章，而在那些較難迅速查驗清楚的問題甚至是故意弄不清楚的問題上做文章，於是拖出了那種很難找到旁證的所謂「裡通外國」問題，拖出了那種鮮有文字記錄的所謂「秘密集團」問題。這些問題雖調查起來困難，但用來定性足可將人整倒並搞臭。

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在眾位老戰友勸說下，從維護團結願望出發，作了違心檢查，用他自己的話說：「要什麼給什麼」。實際上，他並沒有完全做到「要什麼給什麼」，至少沒有給出兩樣東西，即承認上述兩大罪名。因爲他強烈地意識到：這不僅在毀滅自己，而且要「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⁷。

6 同前註，頁1088。

7 《彭德懷自述》，頁279。

如今連廬山會議都沒有定下的這兩大罪名，竟在全黨五級幹部大會上被正式開列出來：劉主席既在書面報告裡將它們寫出來，又在口頭講話中將它們提出來；毛主席則坐於一旁不斷插話以將它們點出來。這就不難理解彭何以在獲悉後心膽俱裂、怒吼不止，何以在一年中三次上書、反覆申辯。

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和黨中央。全文長達82,000字，後被稱為「八萬言書」。

如果說他1959年上書是倉促寫成的，那麼他此次上書就不同了，雖直接起因於「七千人大會」關於「唯彭德懷案不能翻」的結論，但醞釀過程已有數年之久。這期間，不僅彭本人有了許多獨處深思的時間，而且事實發展也為他提供許多可資運用的材料。因此，他的「八萬言書」寫得充充實實，幾乎把所有強加於他的罪名都給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既平了1959年老帳，又平了1962年新帳。

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曾把彭德懷意見書定性為反黨綱領。此次彭德懷上書，則緊緊抓住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那段話，即「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藉此作出推論：「這就是說，那封信就不是什麼『反黨綱領』了。」⁸ 這一論證是很有力的，它著眼的是結論性的問題，採用的是揭對方自相矛盾的方法。對此，毛劉等人是很難從道理上予以回應的。

1962年「七千人大會」正式給彭德懷開列出來的那兩大罪名，是「八萬言書」所要申辯的重點問題。彭深知這些罪名的嚴重性，也深知那些開列罪名者的心虛處。於是，他詳談了自己過去與黃克誠、高崗等人的來往關係，詳談了自己在1936年至1958年期間與外國人九次接觸的具體情況；並反問開列罪名者：你們說的如是真話就不難拿出證據來，你們能拿出來嗎？

關於「裡通外國」罪名，彭是這樣寫的⁹：

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97。

9 《彭德懷傳》，頁682。

我首先申明，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外國語言和不識外國文字的人，這就給查對事實的工作帶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同外國人的每次接觸或談話，都有翻譯同志跟隨著。總之，是有充分條件來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的。我誠懇地要求黨中央根據一貫實事求是的原則，派專人徹底清查這一是非問題，如發現事實確據，按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

彭將軍說這些話，是在向整人者叫板：你能拿出證據，我就奉出腦袋。字裡行間又流露出一些硬氣來，又要讓老人家不高興了。

8月22日，彭德懷在「八萬言書」遞呈兩月未見回音後，再次上書，仍是既作請求又講硬話¹⁰：

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組審查，處理我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如查有確實證據，願受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制裁，那怕是處以死刑和開除黨籍，都是不會怨恨的。

臨近信尾，他又丟下這樣一句話：「只要把這一問題弄清楚，以後，我不會再來打擾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言下之意，如仍不予認真審查，怨我老彭還會再三上書。

就毛澤東來說，也不能不作答覆了。一是彭德懷「緊逼盯人」太甚，沒完沒了。二是所有政治局委員已人手一份「八萬言書」，大家讀完了都抬著腦袋看他。三是在與人相鬥中來而無往不合他一貫性情，既有人前來叫板，就得將他打回去。

實際上，在彭第二次上書之前，毛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到彭第

¹⁰ 同前註，頁683-684。

一次上書，說彭德懷要翻案，說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但未將這個問題作為該會正式議題。

只是到了八屆十中全會（包括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上，也就是彭第二次上書後，毛才正式回應彭。全會第一個星期主要批「單幹風」，此後就集中批「翻案風」，批其代表人物彭德懷。

據當事人薄一波記述¹¹，「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範圍會議，佈置要把彭的兩封信拿到全會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充滿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指責彭的上書，在國際上配合各種反動勢力進行反華活動，在國內利用國家暫時困難向黨進攻；並翻揭彭的歷史，說他一貫反對毛主席，既同高饒結盟過，又同王明勾結過；甚至把他說成是現代的張邦昌，石敬瑭……

毛澤東如此答覆，反倒使彭德懷清醒起來。前次七千人大會對他的誣陷，曾使他暴跳如雷；此次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加倍誣陷，卻未使他再次大怒。彭已不指望這位黨主席會講公道了，更不指望那個奉毛如神明的黨中央會主持公道了。

當年年底，他又第三次上書，再度反駁各種強加於他的不實之辭。只是他此次上書已不抱平反希望，僅為表態而已，即表明他老彭仍是不服：上次開會栽贓，我起而反駁；此次開會栽贓，我再起而反駁；你們只要造謠中傷，我就有話要說。

毛的中央此次沒有回應彭的上書，彭也就不再去寫他的申辯信了，而努力去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那座由中央指定居住的據傳曾是明末叛將吳三桂私宅的吳家花園中，彭安然度日，孤燈讀書，只身耕種。

讀書使他把自己不再比做「張飛」，而是比做「于謙」，即不僅以「勇」而且加之以「冤」來自注人生，同時也暗以無道的「明英宗」來諷喻紫禁城裡的那位新主子。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92-1094。

耕種使他重操祖業，使他再次認識到最適合自己幹的事，除了做將軍外，就是當老農了。

八屆十中全會批「翻案風」，除批彭德懷外，還批小說《劉志丹》，斥之為高崗翻案，並以此為發端批出了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亦稱「西北反黨集團」）。

習仲勛與劉志丹、高崗等，同為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陝北蘇區的領導人。他們都曾在當地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尤其劉志丹家喻戶曉，以致有「只知劉志丹不識毛澤東」的說法。1936年劉志丹意外死亡，曾在陝北人民中引起震動與悲慟，老百姓自發送葬隊伍綿延數裡。

這些陝北老同志也是北上三大紅軍（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餘部的收容者。沒有他們創建的根據地，就很難有毛澤東等疲奔兩萬五千里路後的落腳點，很難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很難有「棗園窯洞」的燈光。

到了1962年後，這些創建陝北蘇區的老同志們，除了死於戰爭者外，大都被他們自己的黨整倒了，一部分隨「高崗集團」被整下去，一部分隨「習仲勛集團」被整下去。

毛澤東批「翻案風」，也批到鄧小平身上，指責他在主持甄別平反工作時大刮平反之風：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¹²。

毛此時雖未把鄧小平當作政敵來批判，但已對他表示不滿。毛鄧反目初見端倪。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既對日前他所受到的挑戰作出嚴厲反擊，狠批「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又對日後他所要做的事情作出重

12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41。

要部署，提出一條政治路線，要求執政黨大抓階級鬥爭。老人家又處在亢奮中了。

然而，這些回答對於毛何以作出1962年「轉折」這一重大決策，卻無補於事。本章將從毛的執政方式、毛和毛的領導集團與黨、國家來進一步回答上述問題。

需要重申的是，儘管毛一再聲稱要「把不來戰爭等條件，弄到和平條件上來」，但毛在1959年大躍進高潮時期對劉少奇、鄧小平等時常時鬥時合的「和平」政策，始終持保留態度。毛認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和平」政策的理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是「和平」政策的「修正」。

34

1962年，執政者毛澤東在其一低頭與其一昂首間，完成了他由主要搞經濟建設向主要搞政治鬥爭的轉折、由據以守勢地位向據以攻勢地位的轉折。

其低頭，顯示了他從經濟戰線上被迫退卻的態勢。他此後除了喊喊像「抓革命、促生產」這類大而化之的口號外，再也沒有於這方面做出什麼實質性工作來。

其昂首，顯示了他在政治戰線上主動進擊的態勢。他很快就搞起一場場政治運動，以清洗一批批政敵。

這同時，預示著他身上原有的政治職業病將迅速惡化的趨勢。他的「政治被迫害狂想症」將繼續加重，將使他把由自己直接領銜的中共決策圈中的許多人都懷疑為蓄謀反對自己的人，並把他們都至少整治了一遍。

他的「政治多動症」將繼續惡化，將使他治理起國家來就像頑童擺弄玩具一樣，拆了再裝，裝了再拆，一直擺弄到拆了再也裝不起來為止。他搞了一場又一場運動，搞到「文化大革命」時就搞得收不了場了，就搞得其黨其國面目全非了。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出這種由「低頭」到「昂首」的轉折？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執政趨向從搞經濟建設上轉移到搞政治鬥爭上？

前文已就此問題作過一些回答。（參見本書第13節）

其一，他之所以要從經濟上退卻，一是緣於客觀情勢所迫，即老人家闖的禍太大而自知難卸其責；二是出自主觀心理需求，即老人家需要有一個自我心理調整時期。

其二，他之所以要在政治上進擊，一從性格上看，毛是一個極有表現慾的政治家，總想另搞一套來搶別人的「戲」；二從策略上看，毛又是一個擅長於游擊戰的政治家，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打你的經濟優勢，我打

我的政治優勢。

顯然，這些回答對於毛何以作出1962年「轉折」這一重大問題來說是不夠的。爲此，本篇還將從毛的執政方式特點和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內涵這兩個角度來進一步回答上述問題。

毛澤東的執政方式有這樣兩個特點：

其一，總以非專業化的方式來實行行業領導；

其二，總以非規範化的方式來從事政治鬥爭。

1962年前後，毛執政方式上的這兩個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執政黨內出現的「條例化」施政傾向的規避中。

1961年-1962年間，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條例年」。當時，幾乎所有行業都在制定「條例」。

農業方面，制定了〈農村六十條〉。1960年底，鄧子恢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修改稿)〉，共66條。1961年3月，毛澤東以上述條例爲基礎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共60條，始稱〈農村六十條〉。同年6月，毛主持修改〈草案〉，擬出〈修正草案〉。1962年6、7月間和8、9月間，毛又兩度主持修改〈修正草案〉，並提交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通過。

工業方面，制定了〈工業七十條〉。1961年5月20日，鄧小平在聽取薄一波匯報時，表示要搞一個涉及工業各項政策的文件。6月12日，毛澤東在談到〈農村六十條〉同時，指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¹。6月17日，中央書記處正式提出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任務，並指定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作。8月11日-14日，中央書記處修改並通過條例稿，共70條。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頒發〈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手工業方面，制定了〈手工業三十五條〉，即〈中共中央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於1961年6月19日頒發。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953。

商業方面，制定了〈商業四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於1961年6月19日頒發。

科學研究方面，制定了〈科研十四條〉。1961年6月，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共同起草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14條意見(草案)〉。6月20日，聶榮臻將此〈草案〉報送中央書記處，同時呈遞由他署名的〈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這兩個文件，並指出「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²

教育方面，制定了〈高教六十條〉。1961年上半年，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並報中央書記處。8月，陸定一主持修改這一條例草案，定稿為10章60條。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該條例在教育部直屬院校討論試行。此後，中共中央還批發〈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

文學藝術方面，制定了〈文藝八條〉。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起草了文藝工作條例草案，共10條。8月1日，中宣部將草案印發各地徵求意見。後由陸定一主持修改草案，壓縮為八條。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頒發〈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

其他行業方面，也制定了諸如〈林業十八條〉、〈電影業三十二條〉等工作條例。

執政黨之所以這樣大張旗鼓地制定「條例」，直接起因於當時國內形勢。1958年後，毛澤東跑到前台來指揮一切，插手各行各業工作。可是，此公做起這些事來，不講章法卻好大幹一氣：動不動就「大辦」，這裡「大辦鋼鐵」，那裡「大辦水利」……；動不動就「刮風」，今天刮「共產風」，明日刮「浮

2 國防大學編，〈中央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1961.7.19)〉，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冊，頁499-500。

誇風」……。結果將各行各業搞得混亂不堪。執政黨若要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為這些行業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硬性約束力的規定和條例，以使其行業行為有序。

這種有序有兩方面功用：

- 一是體現在人與物關係上，能夠帶來效率，不去做或少去做無用的功；
- 二是體現在人與人關係上，能夠帶來公平，不認可或少認可例外的人。

這種有序也有兩個特點：

- 一是專業化，即要求分工更為細緻，技能更加專精；
- 二是規範化，即要求規則更為明晰，運作更有章法。

然而，行業條例所具有的這兩個特點直接與毛執政方式上的那兩個特點相衝突：專業化與非專業化相衝突，規範化與非規範化相衝突。因此，這些條例很難容於毛的治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些條例多被斥之為「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多被說成是對廣大革命群眾的「管卡壓」。儘管毛本人曾親自批准過這些條例，甚至曾親自參與制定過其中一些條例。

在科技和教育等條例中，都十分突出地提到所謂「紅與專」關係問題，即無產階級政治方向與具體部門專業工作之間的關係問題，都明確反對用「紅」來壓制「專」乃至代替「專」，反對搞「空頭政治」，都要求把政治工作限定在一定範圍內，使之不能過多影響專業工作。

顯然，這種提法是有針對性的，即針對當時那些本是缺乏特定專業技能卻硬要向特定專業部門指手畫腳的大大小的政治家們——其間最有代表性者莫過於毛澤東主席了。

老人家雖然讀了許多方面的書籍，但未必是這許多方面的專家，如他自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承認的那樣，不大懂工業，不大懂商業，只是懂一些農業，但也懂得不多。他說的是謙詞，也是實話。在社會分工已很發達的今天，他毛澤東可以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比如是搞「階級鬥爭」的專家、是整治人的專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專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專業化建樹。然而，老人家總想領導一切；總想對各行各業發號施令，或指導它們

應該這樣做，或指責它們不該那樣做。

這是個矛盾：不是所有行業的專家，卻又想在所有行業中享有充分的發言權。那麼，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呢？

毛澤東揚長避短：不去大講專業化的東西，這是其知之不多的地方；而去大講「政治」，這是其能說上許多話的方面。於是，在其治下有了所謂「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外行可以領導內行」的說法，有了所謂「批白專道路」、「拔白旗」的行徑。

這種「揚長避短」，可以說是一種「搶戲」行爲，即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

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曾於1962年夏秋間接連召開的那三個會議，原本是想開成工作會議，主要解決農業、商業、工業、計畫等方面的工作問題。因此安排各行業領導作主題報告，談他們本職工作。不過，毛澤東在會議開後不久，便頻頻發言，「講政治」，講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結果硬是把行業工作會議開成了政治動員會議，開成了政治家毛澤東唱主角的會議。

如當事人薄一波所言：「實際上，由於毛主席提出了階級、形勢、矛盾等問題，從8月6日起，會上大部分時間是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和批「三風」，只用了很少時間研究和討論工作問題。」³

儘管毛本人仍然在口頭上強調：不要讓階級鬥爭影響我們的工作⁴。

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72。

4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會上的講話（1962.9.2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41-42。

35

作為一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人們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展手腳的方面發展。那麼，毛在這一方面是如何伸展手腳的呢？

一般說來，人們搞政治有兩種搞法：

其一，講究規範的搞法，可稱之為博弈式搞法；

其二，不講規範的搞法，可稱之為謀略式搞法。

按吳稼祥先生的說法¹，在博弈相爭中，參與各方都必須按一定規則角逐；在謀略相爭中，參與各方則不必按一定規則角逐。

博弈是一種有前定契約關係的競爭。其間的契約關係具有明晰性和強制性。其間的競爭各方都能清楚地知道契約內容，並都得嚴格地依照契約行事，否則，被判違約而遭受處罰。

在謀略相爭中，沒有前定契約關係，沒有已獲各方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競爭各方除了「維護自己、擊敗敵手」這一條外，很難再找到大家都認可的東西了。競爭各方都按照只有自己清楚且只合自己意願的方式進行角逐。謀略相爭因此可以說是一種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約力的角逐，其極端者可以說是一種不擇手段的角逐。

一般說來，現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角逐是博弈的。角逐各方都須依法行事，而這個法是公之於天下的，是由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施行的。另外，角逐各方還須接受社會輿論監督，致使政治家們成為生活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其言行舉止多在眾目睽睽之下。

尼克森可以公開地且聲情並茂地攻擊對手，但不可以背地裡去竊聽對

1 吳稼祥，《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第1章，（上海三聯出版社，1996年）。

手，尤其不可以在事情敗露後繼續欺騙公眾。他雖貴為總統，但只要違反了遊戲規則，拂逆了民眾意願，就得下台他去，成了博弈中因犯規而被罰出局的人。

尼克森也可以說是記者把他搞下台的，是記者把他從黑幕裡一下子拖到「玻璃房子」中，以讓國人飽覽他那身黑衣黑褲走夜路的行裝以及他那副鬼鬼祟祟做夜活的神情。記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在於現代民主制度賦予他們能夠公開報道公共事務的權利。

也可以說，當代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應有之義，就是要把它們的謀略政治轉變為博弈政治，即把大幕覆蓋之下的政治運作方式轉變為眾目睽睽之下的政治運作方式。戈爾巴喬夫在其「公開化」運動中正是作了這樣一種努力。他的這一努力，對於俄羅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尚可討論；但對於前蘇聯黑幕政治的瓦解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決定性的。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政治角逐，有博弈的，有謀略的。

在封建王朝昌明時期，法規較嚴明，君主也較賢達，這就為當時出現的政治角逐，既提供較好的規則，又提供較好的裁判，故而使之具有較多的博弈性質。

到了封建王朝沒落時期，法紀趨於鬆弛，君權也趨於昏弱，故使得各個政治集團難以按照博弈方式進行角逐。他們大都不是依循各方都應遵守的規則來行事，而是按照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行事。他們已不指望有一個公正的權威來仲裁彼此間的紛爭，只求助實力來決定一切。因此，他們間的角逐是十分狡詐的，也是十分殘酷的。例如，東漢末年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團間的爭鬥，以及唐朝後期南司與北司兩大集團間的爭鬥，均具有這種黑幕性質和這種血腥性質。

若從總體上看，在中國封建王朝史中，謀略性角逐要多於博弈性角逐。這除了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明君甚少而庸君昏君比比皆是外，還因為中國封建王朝中的黨爭往往具有無限責任的性質。

此處「無限責任」說法是反借「有限責任」這一經濟法術語的。在現代

企業制度下，某一有限責任公司一旦破產，其產權所有者損失掉的東西僅限於他已投入到該公司裡的資產，而不殃及他在其他方面的資產。這好比在一場賭局中，輸家輸掉的東西僅是桌面上的注資，或僅是口袋裡的現錢。

然而，在中國舊時黨爭中，輸家輸掉的往往不只是已經拿出來的東西或口袋裡裝著的東西，還有自己整個人，甚至還連帶上許多親友，一損俱損。他們或被貶謫，或被砍腦袋，或被株連九族殃及門生故舊。

爲了避免承受這種難以承受的失敗，中國舊時黨爭的參與者們就有可能不惜採用任何手段，即不受任何規則約束，不行博弈之道。

傳統政治角逐的這種非規範性質或謀略性質，尤爲突出地表現在它的特殊形態——戰爭上。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這種手段「是一種暴力行爲，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²

中國老子也曾有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³ 老子所說的「奇」，也可看作一種非規範的謀略方式，一種能使敵方感到變幻莫測故而無所適從的謀略方式。昌明的政治最講法正刑典，成功的戰略則講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孫子則說得更明晰：「兵者，詭道也」；「故兵以詐立」；「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⁴

不過，戰爭並不全是非規範的，而是有奇有正的。就對敵用兵來說講出奇制勝，但就對內治軍來說講軍規森嚴，以至可以說在所有行業中就數軍事行業的條例最多、最嚴格。若有違反軍規者，輕則受罰，重則丟腦袋。

鑒於以上對兩種政治搞法所作的分析性界說，本文傾向於將毛澤東的施

2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8年中譯本），頁26、43。

3 《老子》，第57章。

4 《孫子》，第1、5、6、7篇。

政方式歸入非規範類型或謀略性類型。事實上，毛本人也曾以自嘲的方式承認了這一點。他形象地把自己的施政方式比作「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

就毛個人生涯來看，他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民主政治教育，卻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軍事知識教育，卻坐上了軍委主席位子；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經濟理論教育，卻敢於鼓動各條經濟戰線搞「大躍進」；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卻能夠決定全國所有大學是辦還是不辦、是這樣辦還是那樣辦……

因此可以說，毛澤東是通過自學而成爲執政者的，走出了一條非常個別化的成材道路。在他的這一「自學成材」的道路上，既沒有多少已定的規矩可供他依循，也沒有多少鐵定的章法能使他就范。

再就毛進行政治角逐的方式來看，更能看出其間的非規範性質，看出他主要不是按博弈方式而是按謀略方式來整治對手的。

建國前，毛澤東主要同黨外政敵角逐，輔之以同黨內異己角逐。

前者搞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自是採取那種不擇手段以致敵於死地的方式或說是謀略方式。

後者爭的是按你的主張辦還是按我的主張辦，屬革命黨內的決策之爭、權力之爭，從道理上說應採取按規則行事的方式或說是博弈方式，但實際情況不全然如此，而要視毛的權威達到何種程度而定。

當由別人來制定規則時，毛大致能做到進退有節。他好提意見、好攬權，但在其意見被多數人否決時，在其職權被組織上削減時，基本上能服從組織決定，甚至能服從組織上做出的錯誤決定。

當由自己來制定規則時，毛就逐漸顯露出以我畫線、任人爲親的施政作風來。他主政江西蘇區時就有過這方面的記錄，如重用像李韶九那種順從自己但品質惡劣的人，以致釀成「富田事變」⁵。他主持延安整風運動時又有

5 李銳，〈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我認識的黃克誠〉，《廬山會議實錄》（河

過這方面的記錄，又重用那種順從自己但品質不良的人，以致造成審幹工作擴大化錯誤。

許多中共文獻都把「延安整風運動」說成是解決黨內矛盾方式的典范，說它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講按黨的組織原則行事。實際上，這一運動是有重大缺陷的，從中，既可看出十餘年前「打AB團」的一些遺風，也可看出十餘年後「反右傾」的一些徵兆。

在運動中，一些從事審幹工作的人採用逼、供、信手段，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竟在一年內清出「特務」一萬五千多人，致使有些單位的「特務」數占其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其中，整人最為積極者，也是毛澤東很為信任者，當數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副主任康生。他創意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在半個月內就挖出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⁶。

雖然大多數蒙冤者後來得到甄別平反，毛澤東本人也三臨中央黨校（1944.5、1944.10、1945.2）向同志們道歉⁷，但這個運動畢竟傷害了許多人，並留下了許多後遺症。這些後遺症將隨著時間推移而越顯嚴重。

如今一些文獻談到延安整風中的過火問題時，多將責任歸於康生。可是，康生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是為毛十分信賴的。並且，這種過火問題就發生在毛的身邊，並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雖然康生直接抓的「搶救運動」只搞了十幾天，但審幹過程中的「左傾做法」持續了一整年。又大又猛的火燒的時間很短，可不大不小的火燒的時間很長。顯然，毛是充分知曉並欣然允准燒這後一種火的。

延安審幹最終搞成了「捉放曹」：康某捉，毛公放；康某懲前毖後，毛公治病救人。如此先奪後予，受之者自是記恨前者，感恩後者。許多年後，一些中共老人談起延安整風便罵康生陰毒，並感嘆主席寬大為懷。可是他們

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增訂本），頁347。

⁶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8、280。

⁷ 同前註。

的主席並不記恨康生，並對之重用有加數十年，使之成了中共大員中幾乎是唯一能夠安然老死於毛身旁的人。

另外，康生之所以能夠如此大張旗鼓地整人，除了與深獲毛的信任有關外，也與得到其他中共大員的協助分不開。甚至在一些場合，康也僅僅是協助其他中共大員行事而已。

當時，康生在中共高層中既非數一數二人物，也非數三數四數五人物，其權力作為應是很有限的。如今，由於此人已被他的黨徹底否定了，於是中共黨史上的許多壞事，當初或全是他幹的或不全是他幹的、或是以他為主幹的或不是以他為主幹的，現在都被說成或全是他幹的或是以他為主幹的。

建國後，毛澤東做了十年國家主席，曾一度大抓國家經濟建設，但最終以「大躍進」失敗告終。他到處奔波，顯得比所有人都忙，結果卻未能使他的人民看到繁榮富強的景象，相反倒使他們感到饑腸轆轆的煎熬。

問題還沒有結束。毛澤東搞「大躍進」的失敗，是政治家搞經濟的失敗，故其後果不僅涉及經濟，還會反饋政治，還將影響這位政治家的政治處境與政治抉擇：

其一，他的政治權威將受到挑戰。

當「大躍進」剛顯敗像時，毛就受到彭德懷將軍的挑戰。例如，彭在廬山說過一句很重的話：老毛搞經濟不像搞政治「那樣得心應手」。即是說，此公搞政治還行搞經濟就不成了。此前召開的中共「八大」已做出決議：執政黨今後的工作重心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經濟。若將彭的話與「八大」決議聯繫起來看，即暗示毛已不能勝任工作重心轉移後的執政黨的領導角色了。

又當「大躍進」完全失敗後，毛則受到來自更多方面的制衡。比如，他這位「和尚打傘」式的政治家，已不得不開始面對許許多多「條例」了。

其二，為回應上述挑戰，他將再次搞起他的政治鬥爭，再次發揮他的政治專長。

不過，此次搞的政治鬥爭與以往搞的政治鬥爭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主要是同黨外階級敵人角逐，雙方都殺紅了眼；此次主要是同黨內不同意見者發

生分歧，雙方都是老戰友、都曾生死與共過。

按常理說，前者是敵我衝突，屬你死我活之爭，故而鬥起來就不擇手段了；後者為黨內分歧，屬我長你短之爭，故而吵起來應按規矩行事，即使吵得過火了，也應不出太大的格。

可是，毛澤東沒有作出這種區別。對於這位好鬥的政治家來說，任何自覺或不自覺阻礙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敢於站出來向他挑戰的人，都是他必欲打倒的人，都是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予以處置的人。

當他發現自己在1959年和1962年所受到的制約都來自執政黨內時，便宣布這個黨裡面也有階級鬥爭，也有許多反動階級代表人物，並強調這些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比那些黨外的階級敵人更狡猾、更兇惡、更有危害性。

又當他把黨內不同意見者宣布為階級敵人時，便意味著他在與這些人衝突中，可以採取任何鬥爭方式，其中包括許多非規範的鬥爭方式。因為，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是很難講什麼博弈規則的，何況挑起這場搏鬥的人本來就是一個好於謀略的政治家、一個熟讀二十四史長於詭詐之道的政治家。

這不禁使人想起法國大革命中的那句最為恐怖的話，即宣布某某人或某某黨不受法律保護。當時，在作了這種宣布後，人們就可以對這某某人或這某某黨採取任何極端措施，或實行囚禁、或動以酷刑，或送上高高的斷頭台，甚至不允許他們為自己辯護。最初，革命者宣布叛亂的僧侶和貴族不受法律保護。不久，革命者內部又自相殘殺起來：先是孔多塞等吉倫特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繼是丹東等山岳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最後則是羅伯斯比爾等雅各賓俱樂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像丹東和羅伯斯比爾這樣的雄辯家，曾經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最為感人的論證，最終卻不能為自己做出任何方式的辯護。因為，革命的法庭不允許革命的敵人享有這一權利。丹東被以不尊重法律的名義剝奪了辯護權，羅伯斯比爾則被以更富有戲劇性的形式剝奪了辯護權。

1794年熱月9日，羅伯斯比爾出席國民公會，但被與會者屢屢用「打倒暴政者」的口號聲剝奪了發言權。在絕望中，他向議長喊道：「殺人兇手的議長，你能不能最後讓我發一次言？」在被拒絕後，他又向聽眾喊道：「純潔的人們，有道德的人們，我就靠你們了，殺人兇手們不准我發言，你們准許我發言吧。」在被又一次拒絕後，他口吐白沫，頹然坐下，欲言又止地聽任大會做出逮捕他和其同黨的決定。當晚，巴黎發生暴亂，隨即被平息。第二天黃昏，革命法庭將雅各賓派的領袖們送上了斷頭台。當羅伯斯比爾人頭落下時，人們爲之鼓掌達數分鐘之久⁸。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前不久，羅伯斯比爾的同黨庫東提出一項法案，其中有這樣一條：「法律決不准許陰謀分子有辯護人。」⁹ 時隔數月，該項法案的提議者本人以及附議者羅伯斯比爾，就是按這條法律被審判的。剝奪者也被剝奪。

類似事情也發生在中國。1967年夏中南海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拉上批鬥會，被強按著頭作彎腰狀達數小時，其間不斷遭到謾罵、扭打，蒙受種種羞辱。會後，他於憤怒中一手扶著桌子站立，一手拿著憲法抗議：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爲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¹⁰

可是他不明白，他已被這個國家的「偉大領袖」以及「革命群眾」認定是最大的「走資派」，是最危險的階級敵人，故而是可以用一切手段予以打

8 米涅，《法國革命史》，第9章（商務印書館1977年中譯本），頁230-254。

9 同前註，頁236。

10 劉平等，〈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紀實》（華夏出版社，1986年），頁30。

擊的人，即已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他此時卻要去尋求法律保護，無異是緣木求魚，至於他還以這戴罪之身去捍衛這個法律，就更是不得要領了。

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到頭來竟弄不清楚曾由其本人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究竟有何種權威，弄不清楚在它的條文形式與它的實際行使之間究竟有多大距離。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共和國的悲劇。

鑒於「大躍進」無序且無效的教訓，執政黨在1961年至1962年間制定出一系列行業條例，以使各項工作走上專業化和規範化的道路，並使本黨主席所實行的那種非專業化和非規範化的執政方式受到相應的制約。毛澤東若要繼續抓國家常務性工作、抓經濟建設，就必須面對這些條例、就應該按其要求行事。

顯然，這種條例化傾向不合毛的意，不能為他所容。可是，他也不能直接否定這些條例，因為它們或曾是由他親自主持制定的、或曾是由他親筆簽署生效的。這似乎是一個矛盾，但實際上是一個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因為老人家已另闢蹊徑了。

1962年，毛澤東完成了他的施政重心的轉移：將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於抓經濟建設、抓已訂有各種條例的具體行業工作，而是用於抓政治、抓階級鬥爭；並通過抓這種領導一切的政治工作以抵制那種行業工作中的專業化傾向，通過抓這種不擇手段的階級鬥爭以抵制那種政務工作中的規範化傾向。

老人家是很看好《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孫行者的。他自己何嘗不也是一個孫行者式的政治家，何嘗不也是在那兒一會兒翻筋斗，一會兒變身法，鬧個不停，直鬧得他那些盟兄弟們不勝其煩。於是，大家齊心協力在他正翻騰蹦躍的山上打了許多樁，圍了許多欄，好讓他進出有規，舉止有距。可到末了，這位孫行者一個筋斗，便從這座四處是樁是欄的經濟建設之山上，翻躍到了那座難以打樁圍欄——即使打了圍了也能輕易地拔了扯了——的階級鬥爭之山上，並轉過身來把那些想羈絆他的盟兄弟們收拾一番。

老人家曾有些看不上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在他看來，後者的缺陷不僅在於它後來變成了修正主義，而且在於它本身搞出了教條主義、搞出了許多條

條框框。這些條條框框死板僵硬，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故而是中國人在搞自己的社會主義時應予以防止的東西。1950年代後期，雖然中蘇關係還沒有公開破裂，但毛的黨已在軍事教育中大批「教條主義」，已在「大躍進」中大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裡所要批的「教條主義」以及所要破的「迷信」，大多指「蘇聯老大哥」搞的那一套繁瑣程式。

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有它的問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也有它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史達林搞出的是一個條條框框的社會主義，毛澤東搞出的則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

前者雖也有過肅反擴大化等問題，但總體上是有秩序的，有時也是有效率的，以致達到過世界第二強國的位置。後者雖也有過日新月異的發展時期，但總體上是缺乏秩序的，同時也是缺乏效率的，以致瀕臨過崩潰的邊緣。

不過，壞事與好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由於它自成體系已久，有著高度的自我約束性，有著許多難以捨棄的貴重物品，故而改革起來阻力較多。它是渾身負重而趑趄前行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則由於它本來就沒有多少十分嚴整的規章制度，沒有多少值得牽掛的上好東西，故而改革起來容易得多。它是光著膀子穿著短褲而跑步上路的。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有人曾把毛澤東的那一套搞法戲稱為「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後者並不覺得它有什麼不好，反而認為它比其他類型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大城市裡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或三者兼而有之的馬克思主義如王明的馬克思主義——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論，這種「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有長處也有短處。

其長處在於它能走十分難走的路，甚至能走先前沒有路的路，有時還能手腳並用地爬上那高高的懸崖峭壁。

其短處在於它要到了一馬平川處卻不知如何走是好，真要上了現代公路後卻不懂交通規則，也不想學習交通規則，並厭惡乃至拒絕遵守交通規則。

事實也是如此。毛澤東總想開社會主義快車，並且總想不看紅綠燈地開

社會主義快車，結果只能將他的這輛快車變成一堆廢鐵扔在半道上。

總而言之，毛澤東這位「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成就於山間小路，卻不能凱歌於平川大道；能夠在無序中謀略克敵，卻不能在規範中博奕取勝。

毛澤東無疑是一位很有理論嗜好的政治家，不論做大事還是做小事，總要為自己找出幾分理來；並且，不論講大道理還是講小道理，也總能使一些聽眾聽起來像是有那麼回事。1962年，他在做出由主要搞經濟轉為主要搞政治這一重大決策時，也講出了他的一番道理來。這番道理集中體現在由他親自審定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一段話裡：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

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很激烈的。

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1959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重

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勝利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進攻，維護了黨的路線和黨的團結。無論在現在和在將來，我們黨都必須提高警惕，正確地進行在兩條路線上的鬥爭，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不斷地加強黨的團結，不斷提高黨的戰鬥力¹。

這段話後來被確認為「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被認作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不過，這個「重大發展」，最終把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整個國家都發展到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中。

關於這一理論，人們已作了種種批判，就連執政黨自己也在「文革」後予以徹底否定²。對於這些批判，筆者有的贊成，有的不盡贊成。

與「徹底否定」論不同，在這個非常錯誤的理論中，也包含著某些真實的東西：或反映了新中國史上的某些真實的情況，或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某些合乎邏輯的思想過程。毛畢竟是一個有一定觀察力的人，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客觀事實；同時，他又是一個有一定判斷力的人，不可能將自己看到的某些事實以完全顛倒的方式連接起來。借用毛的俄國老師列寧批判唯心主義的話說：他所創制的這個理論不是「純粹的胡說」，而是抓住了事物發展過程中某些「真實的片斷」，只是將其誇大了而已³。

比如，老人家在這一理論中告誡他的老百姓：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共產黨國家轉而走上資本主

¹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1962.9.27），《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66。

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7節，《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755-766。

³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11-412。

義道路的危險性。

他的這種講法不能說毫無道理，甚至可以說講得不夠。當時毛講的還只是可能性，如今這種可能性已變成現實性。如果可以從經濟上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話，那麼可以說，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走上或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又如，毛告誡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一部分小生產者有著「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他的這種講法也是講得不夠。當時他估算這種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如今看來則要反過來說，即這種人以外的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在現時中國大陸上，農村中的莊稼漢大都在種自家的田地，城鎮中的個體戶則大都在擺自家的攤子，至於國家單位裡的許多人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占著公家的位子，謀著自家的好處。

再如，毛特別指出，黨外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

他的這種講法更是講得不夠。就搞「資本主義」而言，當時他說，黨外影響黨內；如今則是，不僅黨外影響黨內，而且黨內積極引導黨外。

在所謂「發家致富」（發自己家致個人富）上，許多共產黨幹部已經走到了群眾的前面，帶頭幹起了他們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計不讓他們幹的事，並最終當成了他們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計不許他們當的「走資派」。

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走得太快，幹得太火，以致於幹到了另一個極端上。過去，他們打地主，鬥資本家，如今，他們中的一些人竟比當年的一百個地主還要富，竟比當年的五十個資本家還要闊。

有這樣一些家族：祖輩原是鄉間小地主，父輩則為黨內老幹部，子孫輩成了國中大富豪。其父輩出身富家，即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後來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身入死，最後做了「高幹」。其子女承蒙蔭庇，化公為私，遂成富豪。於是乎，這些家族走出了一條「曲線發家致富」的道路。

歷史跟這些家族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也跟那些曾冒著生命危險、承受

巨大犧牲支持中共革命的百姓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只是後者笑不出聲來。

因此，毛澤東在1962年開會時的擔心，不能完全說是杞人憂天。他當初所憂慮的那個天，如今真的塌下來，或正要塌下來。

同理，老人家在1976年臨走時的擔心，也不能完全說是庸人自擾。他當初最擔心的那個人，也是他在歷史上曾像炕燒餅一樣翻過來複過去地加以關照的那個人，後來真的把他曾精心炮製的「階級鬥爭理論」給修正了，乃至否定了，並真的把他曾苦心經營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給改變顏色了，改變成紅(政權)、黃(金錢)、黑(權錢交易)多彩顏色了。

37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雖抓住了一些真實的東西，作出了一些並非完全虛妄的預期，但總體上是錯誤的。就這個理論自身內容來看，其不真實的東西比其真實的東西，要更為基本些，更具有全局性些。

毛澤東將其執政時代定性為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這個定性是不真實的，這個「過渡時期」的起始點和歸宿點都有很大問題：

此起始點被定性為「資本主義」，是不確實的；

此歸宿點被定性為「共產主義」，也是不確定的，至少在毛本人那裡是不確定的。

毛的新中國，用毛自己的話說，是從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轉變過來的，而不是從「資本主義」的舊中國發展而來的。所謂「半殖民地」，指的是舊中國的外部關係性質；所謂「半封建」，指的是舊中國的內部關係性質。依此說法，舊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屬封建主義範疇。

舊中國也有過資本主義的東西，有過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有過資本主義的證券市場，甚至有過帝國主義的「十里洋場」。當時上海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已相當高，已在許多方面位居亞洲前列。不過，就當時整個國家狀況來看，資本主義還不占主導地位，還處在封建主義包圍中。

毛自己就曾對舊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作過一個分析¹：

「第一，中國已經有大約10%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於這一點，中國已經有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政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

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第6部分，《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431-1435。

「第二，中國還有大約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90%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於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不僅舊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且舊中國的政治尤其是黨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帶有封建性成分。

首先，就黨員的階級出身來看，兩黨的許多成員都屬於舊時代的人，都屬於封建主義的範疇。國民黨中曾有許多封建地主。他們自是竭力反對「平均地權」這一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從而使其自身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由於這些人大量存在，使得國民黨不能將其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迅速完成，與此相應，也就不能將其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迅速明朗化。

國民黨這一歷史任務一直被推遲到它敗退台灣後才得以完成。此時台灣，掌權者多是無地的外省人，有地者則多是無權的本地人，故而搞起分田的事來就容易得多了。許多從大陸逃難來的國民黨官吏，已從有地者變為無地者，已與「平均地權」沒有利害衝突。更何況平均本地人的地權，還能給外省人帶來或多或少的好處。這就使得他們把自己曾竭力反對過的事情變成了何樂而不為的事情。必須指出，他們的平均地權是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的，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故少有血腥味。似乎可以說，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並將其驅逐到台灣，反倒成全了國民黨，促使它在此寶島上勵精圖治，終得完成其「先總理」孫中山的許多革命遺願。

與國民黨相對應，共產黨絕大多數成員來自農民。舊中國農民大多掙扎在社會底層，生活困苦，處境艱難，故很容易受到政治鼓動而要求改變社會

現狀，並附諸實踐，從而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成為由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

然而，這些農民與那些地主，雖處在不同社會層面上，但都同處於封建關係中，同屬於將要被現代社會發展所揚棄的舊時代階級。他們身上仍保留著愚昧、狹隘、保守等舊時代印記，並使他們所打下的江山也帶上了這些舊時代印記。

其次，就領袖的權力地位來看，兩黨的第一執政，無論是蔣總裁還是毛主席，在許多方面都很相像於舊時封建宗法團體中的「龍頭大哥」或「掌門人」。

兩人在各自黨內，都享有絕對權威。他們可以任意支配全黨，全黨則不能有效制衡他們。他們都是金口玉言，說一不二。這邊是「最高指示」，那邊是「總裁訓諭」。任何想違逆他們意旨的人，都要受到極為嚴厲的家法懲處。

兩人都享有終身權力。1974年，蔣公在台北榮民總院第六病室裡謝世時，身上仍掛著國民黨總裁的職務。兩年後，毛公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病房中故去時，身上也掛著共產黨主席的職務。

兩人都坐著鐵打交椅，無論對黨有功還是對黨有過，都不影響他們在黨內的權力地位。蔣公1931年丟掉了東北，仍能做他的委員長；1949年丟掉了整個大陸，又仍能做他的黨總裁。毛公1960年餓死了幾千萬人，繼續做他的黨主席；1966年後搞亂了全黨、全軍、全國，又繼續做他的偉大領袖。

兩人都在黨內搞個人迷信。那邊的人見到蔣總裁，便是立正，便是滿臉謙恭相。這邊的人見了毛主席，或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或是興奮得只會喊「萬歲」。平心而論，毛在這方面的作為比起蔣來要成功得多。蔣在其黨內只贏得部分派系對他的忠心，毛在其黨內則贏得五湖四海者對他的崇拜，儘管毛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整得苦不堪言。

人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荒誕現象：在現代中國黨派政治史上，毛澤東可以說最愛整自家黨人，直接地或間接地整了數以百萬計的自家黨人；但又可

以說最受自家黨人尊崇，生前執政廿七年間「萬歲」聲不絕於耳，死後冥誕一百周年時歌功頌德聲甚囂塵上。

曾有許多中共黨人，即使被毛發動的政治運動整得死去活來，也不改對毛本人的赤膽忠心。他們蒙冤受屈，不僅不抱怨毛，反而替他開脫，說自己挨整，是黨內壞人幹的，與主席無關，主席仍是偉大的。例如，在鄧拓身上就表現出這種崇毛情結。鄧是中共一位很有才氣且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型幹部，1930年代加入中共，曾任《晉察冀日報》社長、《人民日報》社長、北京市委副書記。他1966年在「三家村」案中被揪出來，受到狂轟濫炸式的批判，以致深感絕望而自盡。他臨終前還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²

毛之所以能被其黨人迷信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延安整風運動」。

在中共黨史上，1940年代「整風運動」是一件大事，既清算了黨歷次的錯誤路線，也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前者意義比較清晰，也比較積極，其後果直接體現在40年代後期那場摧枯拉朽般的戰爭中。後者意義就比較複雜了，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一面，概略地說，有利於中共打江山，不利於中共坐江山。

中共打江山時拉起來的是一支來自三山五岳的隊伍，其間山頭眾多、派系林立，故需要有一個能夠超乎這一切之上的領袖，既能從組織形式上領銜全黨全軍，也能從指揮才能上駕馭全黨全軍，又能從精神信仰上鼓舞全黨全軍。

當時最具有可能性的人選便是毛澤東。「延安整風運動」則把這種可能變成了現實。「整風」，一方面整服了一個個山大王——90%者都老老實實

²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629-630。

做了檢查，甚至做了違心檢查；另一方面整出了一個鶴立雞群的絕對權威者——毛澤東主席，其思想被寫進了《黨章》裡，其耳邊也響起了「萬歲」聲。於是，〈東方紅〉唱起來了，唱遍了陝北，唱紅了中國。

這是一個諷刺。這個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最初唱的是一曲〈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其後又加唱一曲〈東方紅〉：「他是人民大救星……」。

對於這種前後顛倒、自相矛盾的唱法，人們已作過種種批評。本文僅指出一點，指出它也有一些合理處，即合乎中國的國情，至少合乎中共的黨情、軍情。

毛澤東常告誡其黨人，務必「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³。上述兩首歌的二重唱，恰好體現了這種「結合」。正像兩首歌的歌名所表明的那樣：前者唱的是「國際」的事，可看作「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後者唱的是「東方紅」的事，可看作「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中共黨人光唱前一個歌不行，光講馬列主義大道理是要被砍腦袋的。他們最初高唱的「國際歌」，幾乎成了「就義歌」——中共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先烈被綁赴刑場時必唱之歌。

中共黨人除了唱〈國際歌〉外，還要唱一個歌、一個能反映中國革命實情的歌——〈東方紅〉。因為，唱著它，首先能夠打動中共各個山頭的人的心，他們早就希望有一個能夠使他們心悅誠服進而把他們統領起來的大家長；其次能夠打動作爲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心，他們早就需要有一個能夠代替舊時皇上的人，需要有一顆能夠照得他們心裡暖融融的紅太陽。許多年前，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就對農民這一心理特點作過分析了⁴。事實上，也

3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801。

4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頁117-227。

正是中國農民首先唱出了這首歌⁵。

不管怎麼說，中共自打唱起〈東方紅〉後，就在其打江山過程中沒有吃過什麼大虧。與早先〈國際歌〉成了「就義歌」不同，〈東方紅〉成了「喜慶歌」，成了喜慶新中國太陽升起的歌。

關於「延安整風」樹毛絕對權威的不利方面，主要是在中共坐江山後表現出來的。

打江山搞暴力鬥爭，需要有獨斷權威。如拿破崙所說，他寧願將一團人馬交給一個傻瓜獨自統領，也不願將這團人馬交給幾個聰明人協商指揮。可是，坐江山搞和平建設，尤其是在20世紀世界民主大潮背景下搞和平建設，就不能再搞這種軍事首長制，不能再要這種個人絕對權威。

實際上，中共一些高層領導人也意識到，並做了一定努力。他們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淡化毛澤東個人色彩，並將「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七大」修改的《黨章》中抹掉，試圖收回這個黨曾過度奉獻給毛的一部分權威。

這談何容易。他們一旦把絕對權威賦予像毛這樣極富權慾的人，就不要再指望能把它從後者那裡收回來。此後，毛的絕對權威始終沒有受到有效限制，儘管這個黨裡的一些人士仍作了限制它的努力。頗為諷刺。毛正是憑藉這個黨曾經賦予他的絕對權威，來反對這個黨如今又要限制他的絕對權威。在這類衝突中，前者總是勝方。

尤其到了「文革」時，毛的絕對權威不僅沒有受到限制，反而再度擴張。他在被尊稱「偉大領袖」外，又被加上「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頭銜。

〈東方紅〉不僅在地面上唱，而且到太空中唱⁶。唱了〈東方紅〉還不

⁵ 〈東方紅〉曲調屬陝北信天游，歌詞為陝西葭縣（今佳縣）農民歌手李友源創作（1942年冬）。

⁶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被發射上天，並在遨遊太空之際不斷

夠，還要加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⁷。結果，這個「偉大舵手」把他「親手締造」的黨、把他「雨露滋潤」的國家，駕駛到那一片看不見任何航標的茫茫大海中。

再次，在權力的傳承方式上，兩黨也都搞出了一些封建性東西。

蔣先生直接搞了黨國權力「嫡長子繼承制」，搞出「父子總裁」、「父子總統」。

儘管經國先生頗為爭氣，在其任上逐步開放黨禁，開放言論，做了其父做不了的事，但子承父位這件事，無論怎樣洗刷，也洗刷不淨上面的污痕。這也是如今已換新貌的國民黨身上的一塊老疤，一塊雖已愈合但仍是一眼就能瞧著的老疤。

毛先生雖沒有搞蔣先生那一套，沒有把最高權力傳給自己的兒子，也難以傳給自己的那個腦部受過傷的兒子，但搞了另一套，搞了「個人指定接班人」一套。

他先是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選定自己的權力「接班人」，後又根據自己的意願來廢掉他，一會兒選，一會兒廢，搞得他自己出爾反爾，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

最初，他指定劉少奇為其「接班人」，後覺得此人不合其意，便予除掉。接著，他又指定林彪為其「接班人」，後又覺得此人不合其意，並欲廢去（正當他要廢掉此人時，此人已記取前任教訓，立即遠走高飛，但忙中出亂，飛

播送〈東方紅〉樂曲；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播的這一樂曲旋律，至今仍能隱約回響在筆者的耳旁。

7 〈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詞為：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筆者曾請幾個中年人背這首歌詞。他們都是先一楞，後一哼，便一字不漏地給哼出來了。

了上去卻又掉了下來，跑了出去卻未活了下來)。最後，他又指定華國鋒爲其「接班人」，並在病榻上給後者寫下了「你辦事我放心」、「按過去方針辦」等類似古時「遺詔」的紙條。這一次他沒有再換人，也沒有時間再換人了。他所選定的這個第三任「接班人」，當年就爲他舉行了隆重葬禮，並將他的陵墓修到了京城的正中央，使之成了千古奇觀。

另外，在權力的傳承方式上，還有一個附屬現象，即雙方都有高幹親屬橫行於世現象。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有孔二小姐、龍三少爺、揚子公司、以及相應的「打老虎運動」。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也有一個「三太擾國」問題。所謂「三太」，即「太子」——某些高幹子女、「太太」——某些高幹夫人、「太監」——某些高幹秘書。這些高幹親屬親隨，憑藉其依附性特權而採用各種方式鯨吞國有資產，成了共和國國庫裡的一撥大倉鼠。

筆者有一熟人，曾在國外生活多年，讀過書，做過生意，受了不少「資產階級影響」，回國後到南方謀事，先後與一些太子輩人物打過交道。事後感嘆：「無產階級老革命家的後代」與「資產階級老板的子女」，就是不一樣。後者以靠父母爲恥。前者則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到處打著父輩旗號，拉關係，走門子，搞得不亦樂乎。換作過去的話說，後者搞的是「個人主義」，搞的是「個人奮鬥」；前者則搞的是「封建家族主義」，搞的是「裙帶驕橫，衙內肆虐」。

毛澤東打江山時，口口聲聲地說自己面對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⁸；坐江山時，尤其是在搞經濟建設失敗後，則口口聲聲地說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是「資本主義」，很少再談他的新中國原本是從封建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他之所以改了口徑，說到底是想搞階級鬥爭。他深患政治多動症，久處和平時期，就會感到渾身不自在，就會感到技癢。他總要反對什麼人，總要

⁸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文。

反對什麼主義；並總想反出點道理來，至少不要和自己曾經標榜過的道理發生衝突。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如果一個社會處在封建主義階段上，那麼，它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便是資本主義；又如果一個社會處在資本主義階段上，那麼，它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便是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

按照這一理論，如果毛澤東堅持他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封建社會轉變過來的，那麼，他的國家就不應該反對「資本主義」。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在中國就不應加以消滅，而應予以發展，至少應予以存在。

按照同一理論，如果毛澤東強調他的國家是由資本主義「過渡」而來的，或正處在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那麼，他的國家就不能再搞「資本主義」了，而應同它作鬥爭，以防止它「復辟」。換句話說，他要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整資產階級尤其要整黨內「走資派」，就很有必要了。

可見，關於「過渡時期」起始點定位問題非常重要。按前一種定位，毛澤東就不能大搞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中國本來就沒有什麼像樣的資產階級。按後一種定位，也是毛實際定位，他老人家就可以大叫大喊「狼來了」，即「資本主義」這條「狼」來了，結果吵得大家都睡不了，都爬起來和他一起去四處尋打這條煩人的「狼」。

有趣的是，老人家在世時，本來沒有狼，他卻三番五次地大喊「狼來了」，喊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一夕數驚，緊張得不得了；可到了老人家過世後，「資本主義」這條「狼」——黨內種、黨外種、日本種、美國種——真的來了，大家已是見怪不怪了，來就來吧。

人們或許可以辯解，毛所說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不是1949年，而是1956年。

因為，在這兩個年度之間還穿插一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這一時期裡，「無產階級政權」對現存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把它們都改造得具有社

會主義性質；

因此，1949年只標誌著毛的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它開始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階段，1956年則標誌著毛的社會主義的正式確立，標誌著它開始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後者才是毛所說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

但筆者以為，就所討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來說，上述時間區別不大。

因為，偌大中國不可能在七年左右時間裡一下子從封建性程度很大的社會階段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更何況在由毛當家的這七年裡，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得到很大發展，反而受到極大限制。1949年的中國沒有一個像樣的資本主義，1956年的中國也沒有一個像樣的資本主義。

因此，毛澤東把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說成是「資本主義」，不論是在1949年意義上的，還是在1956年意義上的，都不能成立。

儘管資本主義在中國從來都沒有發展得像模像樣，但毛澤東仍像模像樣地描述它，把它設定為「過渡時期」的起始點，並像模像樣地同它作殊死鬥爭，以防止它「復辟」。毛澤東這樣做，就把自己放到一個類似堂·吉柯德所處的位置上。西班牙的堂騎士自以為是在同強敵作鬥爭，而實際上是在和那個大風車過不去。中國的毛主席自以為是在同可怕的資本主義作鬥爭，而實際上是在和自己的百姓、同志乃至曾生死與共的戰友過不去。

關於毛澤東的「過渡時期」，我們已指出作為它的「起始點」的資本主義是可疑的，那麼，作為它的「歸宿點」的共產主義又如何呢？

對於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對於他曾熱情倡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以及「公共食堂」，中年以上的大陸中國人都不會太陌生，都還能記起一些事來。

他的這種「共產主義」，說到底是一種「烏托邦」，並且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烏托邦」。在其入口處掛著的，當是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但走進去後看到的，多是中國古色古香的東西。

毛澤東前政治秘書李銳先生對此有過一段論述¹：

毛對於他為之奮鬥的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十分「駁雜」的。其中，有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有歐美日本新村思想的影響，也有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的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後者。不論是封建士大夫的大同理想，還是封建農民的平均主義理想，都在他的未來設想中占有相當大的位置。

在毛澤東的思想中，看來是更多地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大同書》裡對理想社會描述得十分具體：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學養院，老則入養老院……等等。

1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0-13。

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賞的。

中國空想主義傳統，除了影響毛的思想外，還直接影響他的執政實踐。

據李銳記述²，當年籌辦人民公社時，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曾把康有為的《大同書》與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讓他們參照學習，以體悟這中西合璧的意蘊。隨後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親自給《張魯傳》作注，印發與會者，讓所有中央委員都來分享咱們祖上早已有了的社會大同理想，對照實踐，古為今用。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可以說再現了東漢末年的「五斗米道」，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張魯僅在漢中一隅行「五斗米道」，毛澤東則在國中處處辦「人民公社」。張的「五斗米道」僅置「義舍」、「義米」、「義肉」，住房吃飯不要錢；毛樹的樣板徐水縣人民公社則搞起了「十五包」，包吃、包穿、包看病、包送葬……還包發每人兩元錢。

不過，好事不長在，「五斗米道」的「義米肉」置不了多久，「人民公社」的「大鍋飯」也開不了多久，甚至為時更短。徐水縣人民公社的人均2元錢只發了2個月就發光了該公社的財政款，全國性「公共食堂」也只辦了1年多就「大鍋」變「小鍋」了。

人們常常說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總喜歡畫圖畫，畫無比美好的未來圖畫。可是，人們若要仔細審視他畫出來的那些東西，就會發現畫中的許多景致，已被前人畫過了。他的「理想主義」，與其說是未來主義的，毋寧說是懷舊主義的。

2 同前註。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與老人家的知識結構有很大關係。在其知識儲備中，關於未來的部分最為匱乏，關於現在的部分有很大片面性，關於過去的部分最為豐厚。

毛澤東關於「過去」的知識，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二十五史」知識，大都取之於他那幾屋子的「線裝書」中；二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知識，集中體現在他的「毛選」中。他對這兩方面知識的掌握，是大多數同時代人難以企及的。

毛澤東關於「現在」的知識，不能說是匱乏，因為他畢竟還坐在執政黨主席位子上，還要「日理萬機」，還要處理許許多多正在發生的事情，故能獲得大量信息；但也不能說是豐富，因為他又在執政者任上，做了許多違反常識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小孩子」一樣³。因此，毛這方面知識存在著結構不平衡問題。

例如，他對種莊稼、打糧食的農業知之不少，但對開機器、辦工廠的工業知之不多。否則不會搞出幾十萬座勞民傷財的「小高爐」。即便是農業，他也只是對扶犁耕田、擔水澆地的事知之不少，而對諸如土壤成分分析，光和作用研究等科學種田的事知之不多。否則不至於對畝產幾萬斤的「衛星田」將疑將信。

又如，他對政治鬥爭策略知之甚多，但對經濟運行方式知之甚少；整倒了一個個政敵，卻搞砸了一處處經濟。在前一個方面，用彭德懷的話說，他是「得心應手」；在後一個方面，用毛自己的話說，他是「冒失鬼」⁴。

即便是政治，他也只是對自己所搞的中國政治知之甚多，而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這可以從他與尼克森的女婿和女兒談話中看出。他坦率地承認，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那兩小盒磁帶竟能把一位美國大總統整下台。當

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819。

4 同前註，頁813。

然，這並不妨礙他仍能就他所不懂的這件事說出一大堆話來⁵。

由於毛澤東關於「現在」知識失之平衡而關於「過去」知識十分豐厚，故使他在設想未來時，常常不能正確地使用其現代知識，卻能熟練地潛運其歷史知識。因此，在他所描繪出的未來圖景中，現代氣息不多而老式色調甚濃。他所設想的「共產主義」，說起來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理想，實際上倒很像是中國老農民的一種夙願。

毛澤東坐了江山後，尤其到了晚年後，長時間埋下頭去翻讀一本本線裝書，間或著抬起眼睛盯著前面說上一些帶有預言性質的話，可話中常常流露出他剛剛讀過某本老書的心得。人們常以為，甚至毛自己也以為，他老人家總能夠在大家的前面發現許多新生事物。可是，這種「發現」常常只是把人們身後的東西挪到了人們的前面。

總之，毛澤東所謂的「過渡時期」來龍不清且去脈不明，作為其起始點的「資本主義」是虛設的，作為其歸宿點的「共產主義」是駁雜的。

5 賈思楠編，《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365-367。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除了有其理論自身方面的問題外，還有其實踐結果方面的問題。就這實踐結果方面來看，它所堅持的東西比它所反對的東西，更不如人意些，更有危害性些。

在毛自己看來，他反對的是「資本主義」，他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反對的只是他自以為是的「資本主義」，他堅持的也只是他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編織起來的，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他折騰出來的，是深深打上「毛記」烙印的。

就這兩個概念原有涵義而言，毛反對的是他並不清楚的，堅持的也是他並不清楚的。他對「資本主義」不甚了解，對「社會主義」也不甚了解。毛澤東曾被其黨人推崇為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後的又一位世界級「無產階級偉大領袖」。

何謂「無產階級」？按馬克思觀點，這個階級最初生長於資本主義制度，深受制度的迫害，了解這個制度的弊病，並最終要埋葬這個制度。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賦予這個階級一個特殊的職業稱號：資本主義的「掘墓人」¹。

顯然，這個「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對象，不是什麼陌生人，而是一個他很熟悉的人，準確地說，是那個曾經生育過他並又虐待過他的惡母親。

我們中國的這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也立志要做一個「掘墓人」，要去埋葬「資本主義」。但問題是：這位出自東方的「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對象，是一個他不熟悉的人，是一個與他沒有多少血緣關係的人。這正是他與那些出自西方的「掘墓人」大為不同的地方。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頁284。

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其本人就是一位中產階級成員的長子，並繼承他的一部分遺產，另外還長期接受恩格斯的資助，而後者兼有無產階級領袖和資產階級老板的雙重身分。

毛澤東執政前，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農村，先是一個富裕農民的兒子，繼是一位農民革命的領袖；執政後，雖住進了城，但很快就將城裡原本就沒有長大成熟的資本主義給連根鏟除了。可以說，毛很少接觸資本主義，很不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馬克思主要是一個學者，常常坐在窗明几淨的大英博物館裡博覽群書。在他讀過的一本又一本書中，大多是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學術專著，以及資本主義政府所作的國情報告。可以說，他掌握了他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給他的有關資本主義的大量知識。

毛澤東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除了推不掉的公務活動外，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掛著厚窗簾的書房裡度過的。不過，與馬克思不同，他讀的大多是中國的書尤其是中國的老書，大多是記述我們民族過去事情的書。誠然，他也讀其他方面的書，也讀資本主義的書，甚至在他那個擺滿線裝書的客廳裡接見過許多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和專家學者，並能與他們談得海闊天空、興致盎然；但是，他再談也談不出一個活生生的資本主義來，再談也談不清他要埋葬的那個社會制度的真實面貌。

毛不僅談不清資本主義，也談不清社會主義。通觀他在執政20多年中對這後者所做的詮釋，是很不確定的，一會兒說是這樣，一會兒說是那樣。聽者聽得不明白，說者怕也是心裡沒有多少底。

例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即「過渡時期」的長度問題。1955年10月，毛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稱這一時期需要五十年到七十年時間。不出三年即1958年5月，毛親自主持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放出風來說只需要十年左右時間。再過四年即1962年9月，毛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竟又說還需要一百年到兩百年時間。這時間上的伸縮性大得也太離譜了。

又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任務問題。毛先是同意以搞經濟建設為

主，後又主張以搞階級鬥爭為主。他先是向自然宣戰，掀起「大躍進」狂潮，後又向人開戰，搞起各種政治運動。即便是搞政治運動，他也沒有十分確定的目標，今天運動到這裡，整這一批人；明天又運動到那裡，整那一批人。

毛對自己堅持要走的路，也看得不大清楚，也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在那裡「摸著石頭過河」。

從思想方法上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許多相似處，前者頗得後者真傳。事實上，鄧也是毛曾垂愛最多提拔最快的兩個人之一（另一是林彪）。當然，鄧與毛也有區別，一個不愛說話，一個總愛說話。鄧對自己不太清楚的事說不上幾句話，例如對十幾億中國人到本世紀末將會如何這樣一個大問題，鄧也只說說諸如「人均收入1,000美金」（後又改為「800美金」）之類的話。毛對自己不太清楚的事卻說得上許多話，慷慨激昂，繪聲繪色。

必須說明，本文質疑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等於主張「資本主義」是不能批評的。事實上，「資本主義」也有許多毛病，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對它的許多批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例如，作為「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本人的學說，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作了許多深刻批評。

他曾在自己著作中，記述了工人階級的惡劣工作條件和貧困生活狀況，進而揭示了僱傭勞動所具有的「異化」(alienation)性質。他指出，僱傭工人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東西，最終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一種反過來強制僱傭工人自己的力量²。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這一批評中，顯示了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即懷有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心，懷有為社會弱勢群體鳴不平的正義感。人們可以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不能無視他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超越自我而趨向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

2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頁43-181。

另外，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著述中，還分析了當時像「打擺子」一樣間歇性發作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他通過研究得出結論：這種「經濟危機」通常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的，而這種「生產過剩」之所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所具有的「無政府性」。結論做到這裡，不能不說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說抓住了資本主義確實存在過的一些問題，故有一定的真知灼見性。

不過，當這位批判者循著上述結論繼續向前推演時，就有些操之過急了。他接著指出，這種「生產的無政府性」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避免的，因而與此相連帶的「生產過剩」以及「經濟危機」也是無法避免的，於是，資本主義喪鐘敲響了。顯然，他的這些結論下得過早了點。

20世紀凱恩斯學說的一個核心部分，是所謂「國家干預理論」，即主張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情況下可通過其「財政政策」和其「貨幣政策」，來干預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以減少它們的盲目性和無序性。比如，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彌補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以避免出現「生產過剩」以及與之相伴生的「經濟危機」。

凱恩斯這一理論後來被運用於「羅斯福新政」，獲得巨大成功。儘管凱恩斯理論也有自身局限性，也為其他經濟學流派所詬難，但有一個事實不能否認：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已有半個多世紀沒有出現馬克思所說的那種以「生產過剩」為特徵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了。

面對當代的理論與實踐，我們已很難再籠而統之地說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性」的了。馬克思的學說畢竟是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階段的產物。人們不能過分地苛求於它，更不能過分地拘泥於它——正像中國大陸上的那些自以為是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那樣。

又如，作為「資本主義相對發達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即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也作了許多深刻批判。

一方面，他們繼續作馬克思曾經作的一些批判，如繼續批判盛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拜物教」，並且用詞更趨激烈，以致認為商品已失去了

它的全部經濟特徵，而只具有拜物教特徵。弗洛姆指出：「在工業化的國家裡，人本身越來越成為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物品不是用來為人服務，相反，人卻成了物品的奴僕。」³

另一方面，他們又作了馬克思不曾作的一些批判，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塞提出了一種頗為新穎的「單面人」理論。這個理論告訴人們，由於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當代發達國家正經歷著一個「社會一體化」過程⁴。例如，科技進步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進而造成社會財富急劇增加。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因此成了福利國家，其社會成員大都能享有優裕生活，大都能擁有汽車、電話、高蛋白食品等。這就使得整個社會在經濟生活上逐步同化起來。又如，科技進步迅速提高了大眾傳媒效能，進而造成公共信息泛濫。電視機、收音機、報紙、雜誌等媒體無孔不入地侵入並占有人們的閒暇時間和私人空間。這又使得整個社會在文化生活上逐步同化起來。另外，這個社會的其他一些領域如思想領域、政治領域等，也都經歷著類似的「一體化」過程。

馬庫塞接著指出，這種「社會一體化」過程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逐步消解了社會成員所應有的個性，尤其是消解了人性中所應有的「否定性」方面。這裡的「否定性」，指的是人性中不滿足現實進而要求「批判」現實或「超越」現實的方面。消解了人性中的「否定性」方面，也就使人成了只有「肯定性」維度的人，即成了只是完全認同現代工業社會強加於他的現存生活方式的「單面人」。

對於這個有著許多毛病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生活於其中的新老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它，而且生活於其中的其他人也批評它，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那裡指指點點地說著它。在其大眾傳媒上，除了有總統、推銷員、麥當娜等發出的誘惑聲外，還有各種牢騷滿腹者發出的抱怨聲、責難聲、怒罵聲。

3 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譯本），頁174。

4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中譯本）。

資本主義確有許多毛病，但至少有一個優點，就是允許你公開地罵它，甚至會資助你罵它，讓你在酒足飯飽之後調侃它、責罵它，不過，你得要罵出名堂來、罵出學術味來。上面提到的馬庫塞在創設他那個怒氣沖沖的理論時，就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作為回應，這個批評者也將自己對此贊助者的感激之情，赫然寫在他的《單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扉頁上。

這個「洛克菲勒」，可以說是現代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成功的資本家之一，以致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格化代表。如今，這個最負盛名的資本家基金會，竟去「惠助」那個同樣是最負盛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個罵資本主義罵得最兇的人。對此，一些自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會說，那是資本主義的「假民主」，是其虛偽性的表現。不過，話得要說回來，馬庫塞先生拿到手裡的可不是什麼「假鈔票」，說出口來的也不是什麼「假大空」。

有兩種批評：一種只是用言辭批評對方，只是訴說對方如何不好；另一種除了用言辭批評對方外，還用行為來駁斥對方，不僅訴說對方如何不好，而且通過做出自己業績來反襯對方是如何不好的。

這好比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要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一是來自台下，即坐在那裡的看客要對她評頭論足，並有可能甩出幾聲「真臭美」的話；另一是來自台上，即那些已站在台面上的其他模特對她的挑戰——不只是在臉上顯出你不行我行的神情來，還真能在「T」型台上走出自己的趟子來。

與此相似，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也有兩種：一是坐在台下的批評，即馬克思和馬庫塞等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只是訴說著它有多麼不好；另一是站在台上的批評，即已執政了的毛澤東、史達林等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能只是在說資本主義的不好，還要做出社會主義的真好，不能只是在「破」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還要「立」出社會主義的新興事物來。顯然，這後一種批評要更難些。

平心而論，相對於馬克思等人來說，毛澤東所做的事情要更難些。因為，

人們不僅能聽到後者是如何指責別人的，而且能看到後者是如何表現自己的，不僅能聽其言，而且能觀其行。這就使得後者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要冒更多的風險。

正如那位驕傲的模特，不能只是站在那裡瞧不起別人，還應下到場裡走出自己的趟子來。樂曲響起，燈光閃爍，眾目睽睽之下，老人家走出來了，走出自己的社會主義步子來了。

40

毛澤東指責資本主義不好，那麼他搞出來的社會主義又如何呢？

從外部關係看，毛的社會主義做到了「獨立自主」。毛及其黨人爲新中國鍛造了一層堅硬外殼，或披上了一層鋼甲，誰都敢碰，誰都敢頂，既碰了資本主義頭號強國，又頂了社會主義老大哥，既動嘴巴，又動手腳，與前者打了一場跨國戰爭，與後者爆發多次邊境衝突。

但就內部關係看，就那個堅硬外殼裡的內瓢看，毛的社會主義未必做到了「自力更生」。毛及其黨人在建國初搞戰後恢復工作，頗有些新氣象，但後來搞社會主義，就不如人意了，尤其是毛親自抓的兩件大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件件失敗，樣樣禍國殃民。

不過，在毛做這兩件大事之間，還有一個相對緩和時期(1962-1966)。這正像一輛向前急馳的車在作拐彎時不得不減速一樣。在此時期，毛從經濟建設上退卻下來，不再主持國家經濟工作了。與之相應，中國經濟形勢也漸趨好轉。在這同時，毛並非偃旗息鼓，又在政治戰線上積聚力量，不時搞出一些新奇動作來，並且，其動作頻率漸趨加快，其動作幅度漸趨增大。與之相應，中國政治形勢又漸趨緊張。幾十年來，凡老人家煞費苦心去插手做的事，準會出亂子，經濟亂子剛平，政治亂子又起。

在大多數時間裡，毛的社會主義都處於緊張狀況。就國家來說，經濟緊張，政治緊張，思想文化緊張；就個人來說，吃飯緊張，穿衣緊張，搞身邊階級鬥爭更緊張。

二十年經營，二十年折騰，或緊或緩或又緊。

毛澤東究竟搞出一個什麼樣子的社會主義呢？

從經濟上看，它是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

從政治上看，它是一個專制的社會主義；

從思想文化上看，它又是一個愚昧的社會主義。

就農業來說，幾乎每一年毛澤東的報紙都報道大豐收，可是二十年後，中國大陸人均農產品產量幾乎沒有變化，甚至為負增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魚業部計畫司提供如下資料：1956年，中國大陸人均占有糧620斤，棉4.7斤，油料16.4斤，肥豬0.10頭，水產品8.6斤。1976年，人均占有糧615斤，棉4.4斤，油料8.6斤，肥豬0.18頭，水產品9.6斤。

二十年比較，除水產品項與肥豬項略有增長外，糧、棉、油料各項不僅沒有增長，反而略有下降¹。

農業勞動生產率方面也有類似情況：1956年，全國農業勞動力共有1,8545億人，共生產糧食3,855億斤，人均產糧2,078.7斤。

1976年，全國農業勞動力共有2.9448億人，共生產糧食5,726億斤，人均產糧為1,944.4斤。

二十年比較，人均產糧減少134.3斤²。

雖然1976年人均農產量與1956年人均農產量大體持平，但1976年時的農民比起1956年時的農民來，要多養一大堆臃腫龐雜的人民公社機構，多養一大幫吃吃喝喝的大隊幹部和公社幹部，因此，二十年間中國農民實際生活水平，不是持平而是下降了。

毛澤東領導數萬萬中國農民走了二十年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一如既往，甚至不如以往。筆者親耳所聞，農民自己就說，在老毛當家那會兒，最好過

1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魚業部計劃司，《農業經濟資料》（1949-1983），頁109。

2 同前註，頁46、142-143。

的日子要數1950年代初分田單幹時，自打搞起合作化運動後就沒有舒坦過，不僅讓你吃喝不好，而且讓你坐臥不寧，盡來些七股八雜的事折騰你。

毛澤東執政農業二十餘年，聲勢造得很大，結果勞而無功。執政之初，他於敲鑼打鼓聲中把土地分給農民單幹，允許他們發家致富。執政之中，他又於鞭炮口號聲中把土地從農民家中收回來搞合作化，許諾他們很快就能過上共產主義好日子。可是，到了老人家去世之際，中國農民生活狀況依然如舊，多數人仍是吃不飽穿不暖，以致買不起一台私家收音機來仔細傾聽那年9月9日奏起的那曲帶走許多東西的哀樂。

繼而，到了老人家去世之後，中國農民又把地給分了，最初是偷偷地分，生怕驚動那個死而不僵的亡靈；後來因得到中共開明官吏允准而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不過，吃夠苦頭的農民並沒有忘乎所以。他們實際搞的是分田單幹，但嘴裡不說是分田單幹，而冠以諸如「聯產責任承包制」之類的名稱，既能繼續掛著那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旗子，又能很好保住那些中共開明官吏在執政黨內的面子。

中國大陸農業生產方式由1970年代末回到1950年代初，對於毛澤東來說，是人亡政息，對於中國農民來說，則是白走了二十餘年路。毛澤東執政農業，自己與自己比，已顯尷尬；若再與前人比、與鄰居比、與宿敵比，就更顯寒碇了。

說來慚愧，在人均年糧方面，現代中國人比起兩千年前老祖宗來，似乎沒有什麼長進。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吳慧研究員估算，西漢時人均年糧約為36漢小石³，每漢小石若按小米量稱約合今32市斤，若按粟量稱約合今27市斤⁴。依此量算，36漢小石的小米約為1,152市斤，或36漢小石的粟約為972市斤。不論按小米算還是按粟算，西漢人均年糧都高於毛澤東治下人均年糧，不論是1956年的620市斤還是1976年的615市斤。

3 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頁68。

4 同前註，頁43。

可見，西漢王朝的臣民們山呼其皇上「萬歲」還有些道理，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高呼其主席「萬歲」就顯得過於熱情了。就在中國大陸農業停步不前時，世界其他地區正進行著一場「綠色革命」。這場「革命」以開發利用農業生物系列技術為主要內容，即通過採用良種以及合理運用化肥與灌溉來大幅度提高農作物產量。「革命」發生在1960年代前後，最初以墨西哥國際玉米和小麥改良中心與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為原點，繼而向許多發展中國家輻射，結果顯著改善了它們的農業面貌，提高了它們的人均年糧水平。

根據聯合國的糧食和農業組織報告，在1955至1975年的二十年間，除中國等中央計畫經濟國家外，所有發展中國家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4.28%，其中遠東地區發展中國家（均為我國近鄰）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5.44%⁵。同一時期我國人均年糧提高2.81%⁶（1955年為604斤，1975年為621市斤）。若按1956至1976年的二十年統計，我國人均年糧提高0.81%（1956年為620斤，1976年為615斤）。

最令毛及其黨人感到面上無光的，就是與自己宿敵相比，與海峽對岸的執政黨在農業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澤東大搞合作化大辦人民公社的同時，台灣島上的農民們在由政府推行的贖買性土地改革完成後，經過努力經營，很快就發家致富了。

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看：大陸人均產值，在1956年為261元人民幣（按當年價格算，下同），在1976年為580元人民幣⁷；台灣人均產值，在1956

5 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生產年鑑》（羅馬，1971年、1980年、1981年；轉引自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中譯本），頁64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漁業部計劃司，《農業經濟資料（1949-1983）》，頁109。

7 同前註，中國大陸1956年社會總產值為1,639億元人民幣（頁48），當年總人口為62,828萬人（頁34），故人均產值為260.87元人民幣；1976年社會總產值為5,433億元人民幣（頁48），當年總人口為93,717萬人（頁34），故人均產值為579.72元人

年為141元美金，在1976年為1,122元美金⁸。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二十年間，大陸人平均產值提高幅度不足1倍，台灣人平均產值提高幅度則在5倍左右。

如今兩岸人民的收入差距更大。到1992年，台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10,000元美金⁹，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043元人民幣¹⁰——按當年人民幣與美金匯率5.72：1換算約為357元美金。

儘管按人均GNP算法與按人均GDP算法不同，並且按國際匯率計算收入與按實際購買力計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兩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里計了，已不是相差一兩個層次問題了。

今天中國大陸到處都有殷富的台商在辦廠開店。據知情人說，來者多為台灣中小企業家，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就會是農民。如今這些台灣的老農民比起他們大陸的老同行來要神氣得多囉，竟以闊老板身分廉價地僱傭後者替他們打工，其中少數不良分子還僱傭後者的女兒給他們做露水夫妻。

這種情形，對於曾以農民為主力軍而進行了長期戰爭的中國革命來說，對於曾向農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種種許諾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一種令後者無地自容的諷刺。

儘管毛澤東淫威執政黨二十餘年，但其黨裡至今仍有一批還保持著正直品性的老共產黨人。可是，他們的正直品性將給他們自己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將使他們在面對上述情形時汗顏無地，既愧對那些曾經捨命支持過自己

人民幣。

8 高希均、李誠主編，《台灣經濟發展》，附表1(A)(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頁274。

9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3*, Funk & Wagnalls Corporation, 1994.

10 馬洪、孫尚清主編，《經濟白皮書1992-1993中國經濟形勢與展望》附錄(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中國大陸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3,938億元人民幣(頁342)，當年年底人口總數為117,171萬人(頁359)，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043元人民幣。

的中國農民，又羞對那些曾經慘敗於本黨的政治宿敵。

這後者則會於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災樂禍的調子：

國共決戰，豈止戰場，最終還須市場見分曉；先敗於戰場，後興於市場，仍為不敗。這正合乎你們自己所尊奉的經濟決定論。過去，我們的水陸坦克車開不上大陸；如今，我們的山地自行車騎上了大陸。軍事反攻大陸，前途渺茫；經濟反攻大陸，捷報頻傳。

不過，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後代人來說，海峽兩邊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邊的人日子過得好些，這邊的人理應為之祝福。不過，這邊布衣草帽的窮親戚在與那邊穿金戴銀的富親戚打照面時，還是會心有所動的，會埋怨自家家長太不會過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黃肌瘦、缺衣少穿，出門碰到熟人常有臉上無光之感。

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樣。最苦者要數那些耕種家裡大片田畝的人。他們與大家長毛澤東在血緣上最近。

毛一生有多重身分。有人稱之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稱之為權術家、陽謀家，有人稱之為老人家、潤之兄……筆者則以為在其所有身分中最重要者有兩個：

1949年前，他是一位農民起義領袖，發於山野，興於鄉間；1949年後，他是一位穿著中山裝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為農民。

無論打江山還是坐江山，毛澤東都與農民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斷許諾，另一方則忠心耿耿、不斷緊跟；結果是，一方來回折騰、不斷食言，另一方則疲於奔命、不斷失望。

土地革命時，毛委員對農民兄弟說，跟著我鬧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後者聽之信之，並為之流血犧牲、在所不辭，以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農民的白骨。

社會主義革命時，毛主席又對農民兄弟說，跟著我繼續幹，就能過上好

日子；後者又是聽之信之，並爲之流汗受窮、任勞任怨，甚至爲之餓肚子送命、一死數千萬。

可以說，毛澤東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數曾生養他並支持他的中國老農民了。

與上述農業情況相比，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發展較爲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時間裡就形成了一個從手錶到核潛艇都能製造的較爲完整的生產體系。這應該說是相當了不起的。

然而，這種發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剝奪農民爲前提的，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方式，把農民創造的許多財富無償地轉移到工業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爲特徵的，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中的企業生產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業資源大量浪費，另一方面又導致工業產品嚴重不足，致使許多商品限量供應，買布要票證，買肥皂要票證，買自行車也要票證。

再次，它是縱比有餘而橫比不足，與其過去比有長足進步，但與其他一些國家比就不太樂觀了。在亞洲「四小龍」中，我們不好與香港和新加坡比，因爲它們屬完全城市化地區，但可與台灣和韓國比。後兩者在1950年代初曾與我們水平相當，到了1970年代末就把我們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就世界範圍看，這幾十年中發生了多次新技術革命、多次產業結構調整，但都與我們失之交臂。新中國屢失良機。

再次，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恰恰是以毛澤東本人不斷對之干擾爲背景的。如毛鼓動的「大躍進」，名爲「多快好省」，實爲少慢差費，賠進大筆資金。用彭德懷話說，如用這些資金買日用品，可以堆得像廬山那麼高¹¹。又如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名爲「抓革命，促生產」，實爲停工停產，以致把整個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

¹¹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28。

最後，它是以人民貧困為代價的。城市勞動者雖比農民收入高些，但總還沒有擺脫那個「窮」字。他們幹個十年、二十年也就提個一級兩級工資、長個10塊、8塊錢，活了幾十年也就吃了幾十年飯、養了幾個孩子，此外別無所剩。

就政治統治方式來看，毛澤東執政二十餘年，可以說是一個不斷清除異己、不斷集權於己的過程，即由多黨聯盟到一黨專政、再到一人專政的過程。

起先，毛與其黨人，通過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以及戰後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清除了中國大陸上的敵對黨派，從而使自身成了沒有政敵的執政黨，實現了以我為主的單一同盟專政，即所謂「人民民主專政」。

在此「人民民主專政」內，有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也有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雖然前者實為說一不二的哥老大，後者僅為側立一旁的小老弟，但這個專政仍有多黨聯盟的形式，仍有七嘴八舌的聲音。

其後，毛又與其黨人，通過一系列的思想改造運動和政治批判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基本清除了「人民民主專政」內的愛提不同意見的民主人士，進而使自身成了這樣一個執政黨，既沒有敢與之作對的政敵，又沒有敢與之爭論的諍友，實現了單一政黨專政，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然而，在此一黨專政內，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甚至能聽到批評黨主席的聲音。毛每做一件大事，總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採取不同措施。

再後，毛又與其追隨者，通過製造黨內路線鬥爭，尤其是製造「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一步清除了執政黨內的不同意見者，將一大批開國元勳打落台下。致使自己身邊不存在任何能夠分庭抗禮的人，最終實現了單一個人專政。

就思想統治方式來看，毛澤東執政二十餘年，可以說是一個大搞愚昧主義、大行愚民政策的過程，即不斷在人民中製造傻瓜、在官吏中培養騙子的過程。

所有專制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都有一個最根本要求，就是「服從」，就是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

然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服從行為是受人的服從思想支配的。人的服從思想大體說來有兩種類型：一是出於恐懼、二是出於信服。

對於統治者來說，前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被迫性意識，它所支配的服從行為是低質量的或低效能的；後者則是一種心悅誠服的主動性意識，它所支配的服從行為則是高質量的或高效能的。因此，任何雄心勃勃的統治者都希望能夠獲得後一種服從。

同時，這些統治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獲得後一種服從，就不能只是訓練被統治者的行為，還要馴化他們的思想，為此，就要對其大搞愚昧主義：

盡可能地貶損其個人作用，以增強其依附感，使其不想表達獨立見識——無此主觀願望；

盡可能地限制其獲得真實信息，以增加其盲目性，使其不能表達獨立見識——無此客觀條件。

當服從者一旦失去自己的獨立見識，也就成了一種工具性動物。當統治者一旦將其治下臣民塑造成這種工具性動物，也就把本應是勞心傷神的治國之道變成了陶然自得的牧民之道，只要吹吹牧笛、甩甩響鞭，就能把自己所擁有的大隊畜群驅趕到任何地方，包括沒有草的地方。

由於愚昧主義政策是以大多數人為對象的，因而實行起來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就需要有一支相應的幹部隊伍來做「群眾工作」。

這支幹部隊伍能夠幫助廣大群眾明確「適合於」他們身分的社會角色意識：在偉大領袖面前，在社會整體之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為了偉大領袖，為了社會整體，個人的一切包括生命、財產和自由都可以拋棄。

這支幹部隊伍還能夠幫助廣大群眾篩選「適合於」他們口味的社會政治信息：有的可告之，有的不可告之；有的雖可告之，但需作一番加工處理，或增之，或減之，或改之。

長此以往，這支幹部隊伍便逐漸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以及講假話的技巧。做假已成為他們性格中的一部分。他們常常能夠擺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式，把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說得信誓旦旦，他們還常常能夠作出一種心中有數的樣子，把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事情說得頭頭是道。

在人民中製造傻瓜和在官吏中培養騙子，是一個統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也是任何愚昧主義施政方式所共同具有的兩個基本方面。老人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搞專制統治也不例外，一方面塑造出千百萬可當槍使、當砲用的「革命群眾」，另一方面又培養了一批批會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的「政治思想工作」。

執政之初，毛澤東或許沒有這種意識、沒有這種十分陰暗的動機；執政末了，老人家確已造成這種事實、造成這種極為醜陋的後果。

41

毛澤東及其黨人常常不無得意地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奪得天下，靠的是「兩個桿子」：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言辭之間，透出一股子綠林秀才之豪氣：老子既能玩槍弄砲，又能舞文弄墨，還奪不了這天下？

就毛個人來說，打天下如此，坐天下也是如此。他執政二十餘年，一方面抓著軍隊不放手，至死都在拿著他的「軍委主席」大權；另一方面抓著意識形態不放手，至死都在宣講他的「革命理論」，都在力圖影響治下人民的思想。

人民是分層次的，至少可分兩個層次：一是所謂「雅文化」層次，以知識分子為主體；二是所謂「俗文化」層次，以社會基層勞動者為主體。

與此相應，專制統治者搞愚昧主義也分兩個層次：對於前者，主要搞學術禁錮，搞文字獄；對於後者，主要搞歪曲報道，搞愚弄宣傳。

在學術領域，尤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毛屬下的思想檢察官們為學術研究做了種種限定：一是畫定學術討論範圍——什麼問題可以討論或不可以討論；二是規定學術思想方法——什麼方法可以採用或不可以採用；三是預定學術研究結論——什麼結論可以得出或不可以得出。

這裡僅以歷史研究——也是毛平生最感興趣的學術領域——為例。

其一，在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時，過於強調其革命性、進步性的一面，淡化乃至不談其破壞性、反文明性的一面，尤其不談農民起義常常具有暴民政治性質。

這種「暴民政治」至少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對社會精英文化的敵視。

其參與者大都長期受到精英文化的歧視，常被嘲笑為「白丁」、「睜眼

瞎」，故對後者隱有一種疏離乃至逆反的情緒。他們一旦興兵造反，就很有可能要對那種曾慢待他們的文化做出過度的反應，以致能幹出濫殺秀才、焚燒典籍的事情來。

二是對一切既有秩序的踐踏。

其參與者大都長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什麼人都可以斥責他們，什麼規矩都可以束縛他們，故很容易在他們一些人心裡產生一種反社會反秩序的情緒。他們一旦洶湧澎湃地湧上政治舞台後，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這種情緒驟然釋放出來，就會打破一切秩序，無視一切規矩，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甚至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有愛護老百姓的農民起義軍，如進京前的李自成軍；也有殘害老百姓的農民起義軍，如入川時的張獻忠軍。

三是易於推出新的獨裁者。

由於愚昧，暴民們很容易被某些心懷叵測的政治家所利用，很容易輕信乃至迷信那些有著非凡政治煽動才能的人。又由於社會無序性持續下去，暴民們不僅繼續攻擊他們曾要攻擊的對象，而且開始相互衝突起來，於是，大家都希望能有一個強人出頭來替大家擺平一切。這個人開始只是大家心悅誠服的大頭領，往後就有可能演變為大家俯首稱臣的獨裁者。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不僅能夠打倒老皇帝，而且能推出新皇帝。亞里斯多德在研究古希臘政治時也揭示過類似情況，即一些對城邦實行獨裁統治的僭主，原本就是平民領袖，就是城邦下層公民在激烈的政治衝突中推舉出來的群眾首領¹。

有鑒於此，中共1949年後之所以輕慢知識分子，除了與該黨領袖毛澤東實行獨裁統治有關外，還可能與該黨的中高級幹部多為工農出身有關。前者是決策者，是蓄意拍板者，後者是執行者，是積極附和者。所以，這個帳似不能都算到毛澤東頭上。

其二，在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的國民黨表現時，過於強調它曾消極抗戰的一面，而淡化乃至不談它曾浴血抗戰的另一面。

1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5卷，第5章、第10章。

這種研究框子被套用在許多大陸出版物尤其是歷史教科書中，造成相當不良的社會影響。

在大陸學生中，沒有人不知道林彪的八路軍115師打出的「平型關大捷」，卻沒多少人知道杜聿明的第5軍打出的「崑崙關大捷」。兩場惡仗的對手都是在日軍中享有「鋼軍」稱號的第五師團。前一仗僅重創其一個輜重聯隊，後一仗則重創其一個野戰旅團。在崑崙關前，日軍步兵第21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被擊斃，其轄下第21聯隊(三木聯隊)大部被殲，其他作戰部隊也均遭圍追堵截，致使整個第五師團陷於被動挨打困境。

此第5師團乃由日軍大本營直接掌握的戰略機動部隊，自1937年後，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幾乎打遍了中國所有戰場：在華北方面，參加了南口之戰、忻口之戰。在華中方面，參加了松滬之戰、南京之戰。在山東方面，參加了沂州之戰、台兒莊之戰。在華南方面，參加了廣州之戰、南寧——崑崙關——賓陽之戰。在此期間，還一度被調至關外齊齊哈爾，準備參加「諾門坎事件」後可能爆發的日蘇戰爭(後因雙方妥協而未大打起來)。

在上述諸戰中，該師團大多處於進攻態勢，只在台兒莊與崑崙關兩地處於被圍攻境地。在這兩者中，又以後者形勢最為嚴峻：台兒莊前，只是它的一個旅團陷入困境；崑崙關前，則是它的整個師團陷入困境，不得不拼命固守待援，直至日第18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趕到後才脫離險境。

大陸許多人都知道，蘇北有個「劉老莊戰鬥」——新四軍第3師一個連隊82人在拼掉日軍170餘人後全部壯烈殉國，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湘南有個「衡陽保衛戰」——中央軍第十軍一個整軍在重創日軍數個師團後全軍覆沒(該軍參戰17,000餘人，傷亡15,000餘人)。

由日防衛廳戰史室提供的資料顯示²：日軍在攻陷衡陽之戰中，先後投

2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下編，第8章第4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90-314；楊正華，〈血戰衡陽四十七天〉，《縱橫》，1991年第6期，頁25-32。

入3個師團(第116、68、58師團)之全部以及2個師團(第13、40師團)之一部，另外配以第11軍(兵團建制)直屬重砲部隊和第五航空軍大批戰機。結果，中方戰死4,100人，被俘13,300人(內中絕大多數為傷員，該軍殘部正因既無法帶走又不能扔下這麼多傷員而放棄突圍努力，並因彈盡糧絕而放棄抵抗)；日方共傷亡19,380人，內含軍官910人。在中日戰爭史上，這是一次很少有的雙方傷亡率很接近的大戰役。

在這場攻防戰中有一突出情況，即日軍軍官——不論高級軍官還是下級軍官——傷亡率非常高。如在日第68師團(主攻師團之一)的3名將級軍官中，師團長佐久間為人中將在第一次總攻中就身負重傷，第57旅團長志摩原吉少將在第三次總攻中被砲火擊斃，第58旅團長太田少將僅以倖免。又如在日第116師團(主攻師團之一)所轄第133聯隊(黑瀨聯隊)第2大隊中，自大隊長至小隊長數十名官佐或死或傷，無一倖免。由此可見衡陽血戰之激烈程度，可見中國陸軍第十軍將士對日作戰之頑強程度。

在大陸學生中，沒有人不知道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卻沒有多少人知道中央軍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後者在當時也極大地振奮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改變了許多外人關於中國軍隊不能作戰的成見。大陸許多人都知道，「八路軍」中有一個左權將軍戰死在太行山上，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國民黨軍隊中也有兩百個將軍戰死在抗日第一線上。這兩百人與左將軍一樣，都是民族英烈。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抗戰，是國共兩黨兩軍的抗戰。人們既不應否認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戰場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應否認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實上，在相當長時間裡，後者所起作用要更大些。

侵華日軍所發動的最大攻擊戰，前期為武漢會戰(1938.8-11)，後期為豫湘桂會戰、即日本人所說的中國派遣軍「1號作戰」或「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1944.4-1945.1)，都主要是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兩次會戰，日方都投入數十萬兵力，並都付出傷亡數萬人代價。尤其後一次會戰，日軍參戰兵力達

40餘萬人，為日本侵華戰爭史之最；其傷亡也十分慘重，如參加湘桂第一期作戰的各師團均「遭受3-4成的損失」³。

中國軍隊所發動的最大反擊戰，為1939年「冬季攻勢」，主要是蔣系軍隊所為。此役，蔣方投入54萬兵力，反擊侵占武漢及周圍地區的日第11軍。該軍為侵華日軍中最大野戰兵團，常轄有7、8個師團兵力，此時司令官為日「陸軍三傑」之一岡村寧次中將。日方評論此戰：

中國軍攻勢規模之大，鬥志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均屬罕見；在中國事變八年間，彼我主力正式激戰並呈顯決戰狀態，當以此時為最⁴。

岡村寧次在其上交報告中，闡述了這樣一種看法：

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4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⁵。

這種看法似有片面性，其中一些提法不能為四億中國老百姓所同意，更不能為中共方面所同意，但內中提供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當時由黃埔系少壯軍官所掌握的中央軍是堅決抗日的。因為，提出上述看法者，不是諸如日本外交官之類的人，而是日本前線指揮官，即他不是從言辭中，而是從

3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下編，頁182、334。

4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編，頁519-520。

5 同前註，頁519。

實戰——屬下部隊不斷受創或屬下官兵不斷流血中，得出這個結論。

換句話說，面對岡村中將，蔣委員長用以表達自己抗日意志的方式，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中央軍打出的槍彈和砲火，以及付出的鮮血和生命。因此，籠而統之地說國民黨「消極抗戰」（中共抗戰史教科書常用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依據同樣方式，我們也可以替中共抗戰業績作出論證。1940年11月，侵華日軍在向東京方面作總體匯報時，對各占領區治安情況作出評估，將最差分打給了中共抗日勢力極為活躍的華北地區⁶。

這也是從作戰對手的角度提供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八路軍」確確實實地給侵略軍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困擾。什麼游擊隊、民先隊，什麼伏擊戰、破襲戰，鬧得華北「鬼子」坐臥不寧，以致「中國派遣軍」總部不得不從華中戰場調來它的最為干練的將軍岡村寧次，以對付八路軍中最有膽識的將軍彭德懷。因此，籠而統之地說中共軍隊「游而不擊」、「只打友軍不打敵軍」，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實際上，無論中共軍隊還是蔣系軍隊，都是既「打敵軍」也「打友軍」，既搞抗日也搞內鬥。抗戰八年，兩者時而相互激勵，你給我一個嘉獎令，我給你一個祝捷電，不亦熱乎；時而又相互詆毀，你說我「游而不擊」，我說你「消極抗戰」，不亦冷乎。大敵當前之下，民族危亡之際，國共兩黨，既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又相互摩擦、內爭不止，一隻手狠打著面前的民族公敵，另一隻手則死揪著身旁的同族異黨，於是構成了一幅很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抗戰圖景。

時至今日，海峽兩岸政府仍是內爭不止，並都想打「日本牌」，都試圖借助日本力量來擠壓同族異黨，結果都只能讓他人左右漁利。

平心而論，國共兩黨都是堅決抗戰的，並都為此而付出巨大的犧牲（就中共方面來說也獲得更大發展）。然而，兩黨相互間評價均大打折扣，都把

6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中編，頁412。

對方的抗戰業績往小處上說，甚至往壞處上說。這或許符合兩黨私利，但不符合民族大義，上有辱先烈，下蒙蔽子孫。

就毛澤東治下的抗戰史研究來說，淡化非屬中共系統的其他中國軍隊的抗戰業績，實是把我們全民族抗戰的巨大畫面塗抹掉一大塊，或塗黑、或抹去，或乾脆撕掉。後人望之不勝嘆曰：

當年日寇鐵蹄曾踐踏我半壁大好河山，

如今御用曲筆又塗毀我半幅抗戰畫面。

如此作史動機姑且不論，其效果無疑是在貶損我們這個民族，是在褻瀆那些抗日英烈，並最終殃及歪曲歷史者本人。

關於上述「衡陽之戰」，大陸有一部歷史教科書只寫了一句話：「國民黨守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投降，衡陽於八月七日（應為八月八日——筆者註）失陷。」⁷

還有一部歷史大辭典在「豫湘桂戰役」詞條中談到此戰時，僅用了四個字：「不戰而降」⁸。

這不禁使人憤然相問：這叫什麼歷史書？這叫什麼歷史學？說出此話的中國人如何對得起殉難此役的中國人？

試想，如果時間退回五十餘年，那麼，什麼人會說出這種話？

國民黨自不會說出這種話，不會平白無故地往自己身上抹黑。共產黨也不會說出這種話，《新華日報》曾於當年城破之日（1944.8.8）發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社論——〈向衡陽守軍致敬〉。日本人也不會說出這種話，否則侵

7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國現代史》，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207。

8 尚海等主編，《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頁440。

華日軍無法向東京大本營說清楚那一萬餘名日軍是因何而傷亡的。只剩下一種人會說出這種話，這就是南京汪偽政權的政治宣傳工作者。

其三，在研究中共黨史上的毛澤東作為時，過於強調他曾有過的「過五關斬六將」業績，而完全不談他也曾有過的「走麥城」經歷。

以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為例。似乎許多人知道，1948年秋錦州之戰，林彪不想打而毛主席強要打，結果大勝。那些史家們說這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革命軍事路線的無比正確性。可是很少人知道，1946年春四平之戰，林彪不想死守而那個主席要死守，結果大敗，並導致大潰退，一退數百里，一直退過松花江才站住腳。那些史家們對此緘口不語。

再以朝鮮戰爭為例。許多官方史家都在談毛主席運籌帷幄，坐在北京指揮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一連打了五次戰役，次次大勝。可是實際上，除前兩次戰役外，後三次戰役打得不理想。究其原因，老人家是要負很大責任的。自志願軍取得二次戰役大勝後，他就有些頭昏腦脹了，頻頻發電催促前線司令員彭德懷去接二連三地發動新戰役，打過三八線，打過漢江，占領漢城，……，彭司令屢屢想修整再戰，但又屢屢被催得連續作戰，最後被催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掉頭返國，趕回北京，闖毛寢宮，掀其被褥，當面直陳前方軍情艱難。

至於毛澤東搞經濟建設餓死幾千萬人、搞政治運動株連上億人那類超級歷史事件，就更不許史家秉筆直書了。在老人家親自關照下的史學領域裡，凡與他本人牽扯較多的地方，就會有一些學術愚昧的東西夾雜其間：或在描述這個黨的重大成就時，過於誇大他個人的功績，而淡化乃至抹煞其他同志也曾做出的貢獻；或在分析這個黨的重大失誤時，過於誇大其政治對手的責任，而淡化甚至完全抹煞他也曾負有的責任。

通觀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形成這樣一個看法：近百年來思想文化最為活躍時期，不是毛澤東執政時期，也不是蔣介石當家時期，而是北洋政府時期以及由北洋政府向國民政府過渡時期。

可能許多人不願接受這個看法，但他們很難駁倒這個看法。因為，這個

看法與其說是推論出來的，勿寧說是直陳出來的，即僅僅是記錄了一些確已發生的事實。例如，記錄了下面一些事實：

在思想信仰上，這是近百年來主義牌號最多的時期；在社會組織上，這是近百年來政團種類最多的時期；在人文學術上，這是近百年來大師級人物出得最多的時期；在政治紛爭上，這是近百年來不同政見獲得公開表達機會最多的時期；永彪史冊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在這一時期；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當時馬克思主義一入國門，就能公開地載於學刊、講於學堂、宣傳於熱血青年。這與後來中國馬克思主義一旦執政就不讓其他主義說話的局面，形成強烈反差。

再反過來說，近百年來思想文化最為禁錮時期，不是北洋政府時期，不是南京政府時期，而是毛澤東主政時期。

蔣介石曾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軍隊」的口號，但未能實現它；毛澤東沒提出這種口號，卻一個不少地實現了它。

不容否認，蔣介石主政時，其黨其國已開始走向專制主義道路，在政治軍事領域大力圍剿異己力量，既殺方志敏，又殺鄧演達；在思想文化領域竭力壓制不同主張，既堅決反對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即便如此，「國統區」裡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其中，有魯迅先生的冷嘲熱諷聲，有李達教授的宣講馬列聲，還有民主同盟的據理力爭聲，……。

到了毛澤東執政時期，不僅體制外的嘰嘰喳喳聲沒有了——此為1957年「反右派」的傑作；而且體制內的「操娘」聲也沒有了——此為1959年「反右傾」的成果；最後只剩下了一種聲音——「毛主席語錄」聲。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就和1960年「公共食堂」大飯鍋裡的情形一樣：清湯寡水。

幾十年來，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人文學科領域基本上沒有培養出大師級

學者，相反倒培養出不少擅長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賣師長的學品不端者。

事情還有更嚴重的一面。按理說，新中國既然培養不出新的學術大師，那就應該更加珍重老的學術大師，以充分發揮他們已有的學識才智——這是舊中國給新中國留下的最寶貴遺產。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些學術大師們在這幾十年裡，幾乎沒有人沒被整肅過，幾乎沒有人沒被要求去寫那些使他們蒙受恥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發別人材料。這些大師們過去個個熠熠閃光，此時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現學術退化情況，很少再寫出傳世佳作來。

其中，最典型者要數老舍先生了。這位已具有問鼎諾貝爾獎實力的中國文豪，創作最鼎盛期在1930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1960年代——並投河自盡於這一時期。據說，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曾投了他榮獲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國家卻投了他應該死去的票。

42

當我們再把目光從雅文化層面轉向俗文化層面時，便看到老人家在普通老百姓中搞思想愚昧主義要更簡單些也更有效些。正是在此處，「大造革命輿論」的簡潔性與明快性都得到了突出表現。

毛澤東直接關照下的各級宣傳部門，能夠十分有效地控制且利用各種傳播媒體，如廣播、報紙、紅頭文件、以及大小政工幹部的嘴巴。通過這些媒體，中南海的聲音尤其是老人家的聲音，能夠迅速且毫無遺漏地傳遍「神州大地」上的村村寨寨、家家戶戶。

在這些傳播媒體中，時空效應最大者，當數廣播了（當時電視還未普及）。它傳得快，播得廣。不僅城裡處處聞其聲，而且鄉間村村有喇叭。喇叭裡有黨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有沙奶奶阿慶嫂的「西皮流水」。

筆者曾見過一些生產隊，飯都吃不飽，廣播可聽得不少。這邊肚子咕咕響，那邊喇叭哇哇叫。這種情景很類似尼克森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的一件事：

當年窮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向蘇聯請求援助時，首先索要的不是糧食，不是武器，而是一個運動場，一個他能夠向成千上萬群眾發表演說的宏大場所。

對此，蘇聯總理大為迷惑，尼克森則能理解。後者認為，蘇加諾就其本性來說，需要不斷演說，需要不斷煽起群眾的激情，因為，「群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¹。同樣，對於毛澤東的宣傳部門來說，群眾可以吃飽肚子，但不能聽不到毛主席聲音，不能聽不到「兩報一刊社論」，不能保不住「革命的激情」。這「革命的激情」也正是這些政治煽動者們「賴以生存的支柱」。

1 尼克松，《領袖們》（知識出版社，1985年中譯本），頁365。

比較說來，在煽動群眾激情方面，印尼人民的領袖遠不如中國人民的領袖。與前者相比，後者鬧得更紅火些，也更壯觀些。後者擁有世界上面積最大、使用率也最高的群眾集會場所——天安門廣場。老人家深患慢性支氣管炎，卻老愛登那座高高的城樓，在呼呼的北國涼風中一站數小時，為的是要向數十萬乃至上百萬欣喜若狂的革命群眾「頻頻揮手」。據說，每登一次城樓他都要生一次病。可是，二十餘年來他總是樂此不疲這登樓揮手之事，直到其親密戰友林彪「自我爆炸」而使他再無顏面登高亮相時為止。

後者還擁有世界上聽眾最多、政治控制最嚴密的廣播網。他只要一聲號令，便能於傾刻間響徹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並激動數萬萬顆向著他人家的「紅心」。在當年貧窮的中國大陸上，發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廣的現代工業產品，就數廣播器材了。正是通過廣播，千百年來一直生活在社會邊緣部分的下層人民，如今一下子同國家政治中心聯結起來了。這對他們來說，似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看到了其祖輩不曾看到的許多東西；似又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被捲入了其祖輩不曾被捲入的許多政治漩渦中，並被迅速塑造成執政者能夠隨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在毛所擁有的各種傳媒中，靈活度最大者，要數政治宣傳幹部們那些翻來覆去的嘴皮子了。他們此一時這樣說，彼一時又那樣說，對張三說是一個樣子，對李四說是另一個樣子。例如，在宣講林彪事件時，他們因人而異，對什麼人說什麼話：對文化程度較高的人說得複雜些，從「鼓吹天才論」案到「設國家主席」案，一並娓娓道來；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說得生動些，什麼林彪一身「怪毛病」，怕光、怕風、怕洗澡；什麼林立果「選妃子」，張三女子，李四姑娘。

朋友相告，有位鄉幹部在給社員群眾宣講此事時，聲色俱厲道：那個「林禿子」真不知足，當了副主席，每天都能吃一隻雞，竟還要反對毛主席，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話雖不雅，但對那些大字不識且又饑腸轆轆的聽眾來說，還是頗有些感染力。

對於林彪出逃身亡這一突發事件，當時不要說廣大群眾，就連許多中共

高幹都不能理解。他們想不通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竟會反對毛主席，想不通毛主席那麼英明偉大到頭來竟幹出這檔子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來。因此，給人們轉思想彎子是一件十分艱巨的任務。這個任務自然落到那些搞宣傳的人身上，並由他們較好地完成了。

又如，在宣講鄧小平這個人物時，他們又因時而異，到什麼時節說什麼話。昨天剛領著大家學文件，說鄧小平是排在劉少奇之後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今天又帶著大家領會毛主席新指示，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棉裡藏針」、「柔中有剛」；明天又領著大家學文件，說鄧小平「死不悔改」，大刮「右傾翻案風」，妄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天再改口，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這些宣傳者說的話變來變去，但變中也有不變的東西，即宣傳執政黨不變，尤其是宣傳毛澤東個人不變。不過，在這不變中又有變的東西，即宣傳幹部的官位是變化的，有的因宣傳不力而遭貶黜，有的因宣傳有功而獲升遷，由科而處，由處而局，由局而部、而中央委員，而中央政治局委員。

民間曾傳有這樣一種說法：「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文件，文件抄張玉鳳話。」張是毛晚年身邊最親近的侍者，也是老人家口齒不清時唯一能聽懂他呀呀話語的人。

張氏所為，很像是明朝大內司禮監秉筆黃門所做之事。後者隨侍皇帝左右，隨錄聖上諭旨，繼而傳出宮外，達於內閣，行之天下。國家大政方針繫於一君主一侍者。

毛晚年施政程序也大致如此，也通過近侍者向下面傳其旨意的。在他的這類近侍者中，除有張氏外，還有其侄兒毛遠新。後者有正式職務，叫毛主席的「政治聯絡員」，專門負責把毛的「最高指示」傳達給政治局（一種直接聽命於毛澤東的機構，類似明王朝的內閣），再由後者將之正式發出，傳達全黨，號令全國。

正像國家的經濟運行講計畫一樣，它的大眾傳媒也講計畫，講所謂「輿論導向」。

什麼可以對老百姓講，什麼不可以對老百姓講；可以對老百姓講的，是在這個時候講，還是在那個時候講；可以講時，是講多，還是講少。一切都嚴格地按照上級指示或「輿論導向」來辦理。

這就像現代化飼養場餵養家禽家畜一樣：什麼可以餵，什麼不可以餵；可以餵的，是每天餵三頓，還是每天餵五頓；每頓餵時，是餵多，還是餵少。一切都嚴格地按照科學配方和科學管理來行事。

當然，兩者也有不同：一是餵物質飼料，一是餵「精神食糧」；一是在「填鴨」，一是在「灌輸革命思想」。

幾十年如此灌輸思想，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扼殺了我們民族在許多方面的生機，由於讓人們只看兩種色調，要麼潔白無瑕，要麼漆黑一團。長此以往，便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別色彩的能力，不知在黑與白之外還有一個五顏六色的世界。持續單調的視覺訓練，造成了民族性色盲症。

又由於讓人們只聽兩種聲音，要麼是咬牙切齒聲，要麼是歌功頌德聲。長此以往，又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傾聽平常音的能力，不知在這兩種聲音之外還有一個娓娓道來的世界。持續高分貝的鼓噪聲，又造成了民族性重聽症。

又由於讓人們只在對立兩極中進行思維和做出抉擇：或者要麼完全正確，要麼完全錯誤，就像小孩子在電影中只看出兩種人，即好人與壞人；或者要麼十分馴服地聽命於人，要麼十分兇狠地撲咬於人，就像看家犬在院門口只認出兩類人，即熟人與生人。長此以往，又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常思維的能力，不知在「一分為二」之外還應有個三推六問，不知在聽到上級指示之後還應問個為什麼。持續愚昧化的思想教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性大腦萎縮症。

毛澤東治下這一思想愚昧化過程，在1960年代後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

步。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一方面，打人、罵人、抄家、砸東西；另一方面，又搞「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整個國家成了瘋人院。

「三忠於」、「四無限」，是「文革」中風行一時的兩組口號。前者為：

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後者為：

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誠毛主席！

「早請示」、「晚匯報」，是「文革」中風行全國的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向毛主席表忠心儀式。許多人家在屋裡闢出一塊淨地，供上毛主席畫像或塑像（時稱「寶像台」）。每天早晚兩次，全家人手持《毛主席語錄》（時稱「紅寶書」），站在毛主席像前，口中念念有詞。早上者叫「請示」，即向他老人家請示今天我該幹什麼；晚上者叫「匯報」，即向他老人家匯報這一天我幹得怎麼樣。

「語錄歌」是一種以毛主席語錄為詞的歌曲，「忠字舞」則是一種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當時一些狂熱的群眾覺著用千言萬語也表達不了自己無限崇敬老人家的感情，故再配以手舞足蹈。一時間，五、六歲孩子跳之，六十、七十旬老人跳之，在自家裡跳，在單位中跳，在大街上跳。

我們這個民族在感情表達上向來含蓄，可如今一下子變得熱情奔放起來，大喊大叫，載歌載舞，幾成西班牙人。這使人不能不承認，老人家在駕馭群眾感情方面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所謂「群眾運動」，實為「運動群眾」。

數十年前，陳獨秀先生倡導了「新文化運動」，其宗旨是廣開「民智」；

數十年後，毛澤東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後果則禁錮「民智」。陳先生曾是毛的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也曾是包括毛式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許多新主義的發祥地。毛如今成了陳先生的思想逆子，「文化大革命」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異化形態。

由此可看出，現代中國人所走過的思想歷程有多曲折。同時可看出，現代中國人把自己的所有思想、所有希望都托付給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實際後果有多荒唐。

43

毛澤東搞思想愚昧主義，除以群眾為對象外，還以官吏為手段。

不過，毛屬下官吏是有很大區別的，有願意講假話的人，有拒絕講假話的人，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人。

毛的執政黨外有講真話者，毛的執政黨內也有講真話者。兩相比較，後者要更多些、更硬些、也更起作用些。

1950年代，執政黨先後發動過兩大反「右」運動，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以整黨外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為主；後是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以整黨內敢講真話的黨政幹部為主。

前者整出了幾十萬「右派」，挨整的人多在知識分子較集中的單位；後者整出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挨整的人遍布全國各地區各行業。

前者的鬥爭僅用數月，1957年一個夏季的熱風就將那些嘰嘰喳喳的「右派」們吹了個乾乾淨淨。後者的較量曠日持久，1959年「廬山會議」衝突只是序幕，此後起起伏伏，其間經過1962年「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前者打倒的人幾十年無聲無息，處於被遺忘的角落。後者打倒的人如彭德懷等，總是不服，不斷申訴；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一些未被打倒者如彭真等，轉而同情被打倒者，並逐漸敬而遠之那位老愛打人者。這些被打倒者與其同情者的舉動，又使得毛澤東很不痛快乃至惱羞成怒，下了置犯上者於絕境的決心並付諸實踐，發動「文化大革命」，到頭來卻獲得置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於絕境的結局。

故可以說，1957年黨外「右派」，只對毛起了蚊叮蟲咬的作用；1959年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使毛傷筋動骨，並染上絕症。

即便1957年「反右」，說是整黨外知識分子，實也整了不少黨內知識分

子，整了不少所謂「紅色專家」。

一位老教授告訴筆者，當年高校裡的「反右派」運動，除了整黨外敢講話者，就是整「地下黨」了。

這裡的「地下黨」，不是指中共執政時的地下反對組織，而是指國民黨執政時的地下中共組織。1949年後，其成員由地下轉到地上，成了執政黨幹部，其中一些人做了高校官員。由於這種特殊的出身，使得他們在「反右」中也相應地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

首先，他們對知識分子十分了解。他們長期生活在後者中，很了解後者，很清楚那些提意見者，從動機上說大都希望執政黨向好的方面發展，縱使說了幾句惡狠狠的話，也只是說說而已，不會真的去做出來；從人格上看也大都是一些真誠直率敢講心裡話的人，並大都是一些很有才華的人。

教授感慨道，無論1949年前還是1949年後，大學校園裡凡熱心關注國事、敢於針砭時弊者，大都是一些很聰明、優秀的學生。因此，當有人說這些提意見者出言不遜、恃才傲物時，前「地下黨」員們是會相信的；當有人說這些提意見者從骨子裡就反黨、反人民時，前「地下黨」員們就難以接受。

其次，他們對知識分子也有感情。他們與後者不但相知頗久，而且相交頗深。他們當年做地下工作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曾經得到過後者的支持乃至捨命掩護，可以說是欠了後者的情分。

共產黨人也要講良心，講以德報德。曾經幫助過你的人如今落難了，你不能裝著看不見，不能去做過河拆橋、忘恩負義的事，而應該站出來替人家說話。這是做朋友也是做人的起碼要求。

再次，他們本人就是知識分子，就是紅色專家。這些人不僅有曾為「地下黨」的紅色背景，而且學有專長，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過高校，一直是既做黨的工作又搞專業研究。

這就把他們與高校中那些扭著秧歌進城的「解放區幹部」分別開來。後者既然是被派來接管大學的，故都有些文化，甚至有些才氣。然而，他們大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學術專業。他們可以作出精彩動人的政治報告，也

能寫出熱情洋溢的宣傳文章，但很難寫出合乎專業規範的學術論著。其中一些人即便後來也學了一些專業知識，但由於不是科班出身，總有些先天不足。另外，他們在學術研究中也常顯出過於強烈的政治情結。這一情結擱在其他地方都有問題，擱在高等學府就更有問題了。他們作大報告可以贏得普通群眾的熱烈鼓掌，但未必能博得學術專家的衷心佩服。後者可以把他們當作校務領導來尊敬，但不會當作學科英才來效範。

老教授說，當時大學裡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在與上述兩類紅色官員打交道時，常常有些厚此薄彼，與「地下黨」出身的幹部相處得隨和些，與「解放區」來的幹部相處得隔膜些，甚至有些敬而遠之。這就有意無意地造成了一些嫌隙。

可是，高校裡真正握有實權的，不是「地下黨」幹部，而是「解放區」幹部。當「反右派」運動到來時，後者主持大局，遂將一些愛說話的知識分子以及一些不忘舊情而替他們說話的「地下黨」，一併打成了「右派」。

中共本由熱血知識分子創建。這些創建者以及許多隨後加入者，大都抱有追求真理和救國救民的理想，並為此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穿行於槍林彈雨之間、奔波在白色恐怖之下。

當新中國終於到來時，他們中大多數人都犧牲了，只有少部分人倖存下來。這些倖存者也就順理成章地做了新國家的新官吏。

不久，這些新官吏們發生了分化：相當一部分人成了新貴族，成了與他們曾經打倒的那些老貴族一樣的人，甚至成了比老貴族更專橫、更驕奢淫佚的人——這倒不是因他們的本性更壞，而是因他們所受到的權力制衡更少；另有一部分人繼續保持革命精神，關心民眾疾苦，敢為他們說真話、擔擔子。因此，這兩類新國家的新官吏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

這兩種人由於都是從刀口上滾過來的強悍之人，都有著一股子狠勁，因此，一旦衝突起來，就會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慘烈。失敗者往往被從高高的台面上狠狠地打落下去，或被貶官，或被流放，或坐大牢，身心倍受折磨，甚至性命都會丟掉。

有那麼一些老共產黨人，一生蹲過各種各樣的牢獄：蹲過敵人的牢獄，或是北洋政府的號子，或是日本人的大牢，或是國民黨的集中營；

蹲過自家人的牢獄，或是所在單位的隔離審查室，或是群眾專政的「牛棚」，或是人民政府的正式監獄。

這不能不說是中共黨史乃至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奇觀。

有人為此調侃這些老共產黨人是蹲監獄的「專業戶」，說他們一輩子都在自找苦吃，並常常吃得不明不白，開始蹲敵人的監獄還說得清楚，後來蹲自家人的監獄就說不清楚了。彷彿這些苦主們畢生幹的是一樁顛三倒四的事業，一樁致使個人命運發生扭曲倒錯的事業。

但事實上，這些共產黨人的曲折的經歷恰恰反映出他們的不曲折的品格。中國自皇帝被廢除到毛澤東執政這許多年來，幾乎所有統治者都給他們的老百姓帶來災難，也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對那些敢為老百姓講話的人予以摧殘。於是，那些決意要為民請命的人注定會過不上好日子，注定會自討苦吃，蹲了張三牢房，再坐李四監獄。雖然監獄不同，一個屬敵人，一個屬自家人；但兩者有共同點，即都隸屬統治者，既都關押不聽話的老百姓，也都關押敢說話的直諫者。

因此，我們不應嘲笑這些人，也沒有資格嘲笑這些人。他們自討苦吃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中國老百姓。他們所受到的冤屈不是他們一己的私事，而與我們每個人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他們個人的苦難史濃縮了我們民族的苦難史。

尤其是，他們完全可以不討這些苦吃，完全可以像他們的許多老戰友一樣成為新國家的新貴族，盡享他們俯拾即來的榮華富貴；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選擇了一條殉難者的路，不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去替人民背負沉重的十字架，顛顛巍巍地走向個人災難的深淵。因此，他們今日坐自家監獄比昔日坐敵人監獄，更能顯示他們「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節來。

誠然，對他們所堅信的東西，人們可以提出質疑，可認為他們堅信的東西，未必就是十分正確的東西，或未必就是可以實現的東西；但是，對於他們在堅持自己信念時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人們不能不予以敬重。他們爲了堅持自己的信念，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忍受了別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彭德懷將軍在被打折了左邊肋骨後，仍要站起來；在又被打折了右邊肋骨後，仍還要站起來，今天寫一封自討苦吃的信，明天又寫一封自討苦吃的信，直到臨死時，還要求和毛澤東見一次面，把問題談清楚。這裡顯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種堪稱民族脊梁的精神。對此，人們豈能加以嘲笑？

真正應予嘲笑的，是這同一個體制內的另一類官吏。這類官吏與前類官吏正好相反，有著不大曲折的爲官經歷，卻有著非常曲折的做人品格。

他們的仕途平平坦坦，穩穩當當，從不吃虧，總討便宜：

57年討了便宜，59年又討了便宜；

文革中討了便宜，文革後又討了便宜；

89年前討了便宜，89年後又討了便宜。

儘管我們的民族在大起大落地折騰，可是他們的官位在平平穩穩地向上浮動。

他們的人格扭扭曲曲、齷齪齷齪、半明半暗、半人半鬼。他們會講假話，會整人：

57年，見他們打棍子、扣帽子；

58年，見他們說大話、放空砲；

59年，又見他們提著棍子、拿著帽子頻頻出場；

「文化大革命」中，見他們高喊「偉大領袖」萬歲；

「改革開放」時，又見他們歌頌「總設計師」英明；

80年代初，見他們屢屢出席解放思想座談會，並踊躍發言；

80年代末，又見他們頻頻出席批判自由化思想座談會，作聲色

俱厲狀。

他們是一群偽官，翻臉就像翻書一樣，做人就像做戲一般。對於這些偽官，人們不僅應予嘲笑，而且應予唾棄。

毛澤東搞愚昧主義的第二個方面，即向普通群眾講假話方面，正是通過他們來具體實施的。他們也因此而顯示出自己在這方面的才幹來。

像六十年前後餓死數千萬人這件大事，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可那些宣傳幹部們在向老百姓作解釋時，硬是把劉的話掉了個，把「七分人禍」說成「七分天災」，硬是把毛澤東的責任推到了老天爺的身上，把「冤假錯案」從地上搞到了天上。由此可看出這些無神論者的膽子有多大。

不過，他們所做的這種文過飾非的宣傳還是很有成效的，竟使許多老百姓真的相信「自然災害」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並相信「蘇修逼債」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至於他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也應對此事負些責任，大多數人都不想，也不敢想。

直到今日，許多當年餓過肚子的人在談到那個年代時，仍然稱「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仍然改不了口。筆者有時也是如此。這使人不禁想起戈培爾名言：「謊言重複百遍就是真理」。

過來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亂的年分。在這一年裡，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都出現了無政府狀況，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商店停業，交通停運。尤為嚴重的是，許多地區爆發了大規模武鬥，先是棍棒，後是槍砲，最後連坦克車也開了出來，一時間幾乎無處不開槍，無處不殺人。廣西南寧附近，死亡枕籍，屍塞邕江。

過來人也都記得，老人家對這種形勢有他自己的說法¹：

1 國防大學編，〈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指示（1967.10.7）〉，《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頁589-591。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這顯然是「指鹿為馬」之辭，卻被各種傳媒當作「最高指示」廣告全國。一時間，「形勢大好」論甚囂塵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結果使深受「文革」禍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懷疑「文革」的正確性，即使懷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筆者一位老同學由外省來京旅遊，借宿我處。一次聊天他突然問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許多老百姓？

此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反而問出我的問題：你難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認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沒有看電視？沒有聽別人講？

他說，當時自己也覺著政府打死了許多老百姓，社會上有這類傳聞，「美國之音」也是這麼報道的。後來單位裡的書記和那些搞宣傳的人三天兩頭把大家集中到一塊，先讀文件，後做報告，講中央決策如何如何英明，講社會傳聞如何如何不實，講這個是謠言、那個是謠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們口味的一切說法都說成是假的。

他提到這樣一件事，政府原先說要宣布「六、四」死難者名單，但後來沒有宣布。他說，大家都覺著有點不對勁，好像有什麼說不出口的東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說得很輕巧：你們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許多老百姓，政府還能不說？不說，就是沒有什麼大事。人民政府是不會欺騙人民的。同學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那些張嘴，你有什麼問題，他們就有什麼說法，橫豎難不倒。

他接著說，講老實話，我們也不大相信他們。這些年來，我們聽夠了他們那套東西，一會兒翻過來說，一會兒倒過去說，沒個準頭。可話又說回來，

真要是講多了，還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問題講清，卻能把事情攪渾，不能說服你的心，卻能搞昏你的頭。要說沒打死許多老百姓，我們不會輕易相信；可要說打死了許多老百姓，我們也有些將信將疑，這不就來問你了嗎？

從同學一席話中不難看出，這種宣傳體制在粉飾太平方面有什麼樣的功用，這幫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說假話方面有什麼樣的才幹，而這些都屬「偉大領袖」留給「總設計師」的政治遺產。

當然，對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論。在這所由毛澤東當校長的假話學校——其校訓詞為「實事求是」——中，有學業成績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夠主動發揮、積極創新的官吏們；也有學業成績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著說、照著做的官吏們；還有學業成績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談到的那些敢說真話的官吏們。

一般學校裡的學生成績都按「鐘形曲線」分布，兩頭低矮，中間高大。毛的假話學校裡的情況也是如此，前面一類與後面一類都是少數，中間一類則為多數。因此，本文在談官吏欺騙時，無意將前面那類人與中間這類人混為一談，無意將這千百萬人都說成是極為可惡的騙子。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個國度裡搞愚昧主義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殺傷力的事。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經歷過各種政治場面的民族，或說是一個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無論其官吏階層還是其民眾階層，無論其雅文化階層還是其俗文化階層，對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著較高的領悟力。他們對於執政者精心炮製的任何東西，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體會之後，不僅有了識別的能力，而且有了應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種取之於你又還之於你的能力，一種對於執政者來說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講假話，人民也學會了向你講假話；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講假話，官吏也學會了在向人民講假話同時也向你講假話。

例如，刮「浮誇風」時，你今天暗示我要報好成績，我明天就給你放個大「衛星」。我放一個，他放一個，大家都來放，放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

誰騙誰了。老百姓被騙，毛主席也被騙。前者愚，後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氣。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後智，後者先智後愚，前者之愚不及後者之愚。

又如，搞「個人迷信運動」時，毛澤東默許林彪不實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實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許林行騙他人，林在行騙他人之後又回過頭來行騙毛本人，並差一點將毛騙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們這個頗有閱歷且老於世故的民族裡搞愚昧主義是一件很難玩得開玩得久的事。執政者可以在民眾中造成一時的愚昧，但無法在民眾中維持長久的愚昧。講假話者到頭來要被假話所害，騙人者終究要被人所騙。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發達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義，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國民間社會廣為流傳著兩句順口溜：

村哄鄉來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

在這個「哄」與被「哄」的鏈條上，一端是村民、村長，另一端則是總理、部長。你「哄」我來我「哄」你，「哄」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哄誰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還是你比我蠢。

上述可見，毛澤東搞出的「社會主義」，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很成問題的。從中，人們看不出它比資本主義有多少優越性，相反倒看出它比資本主義更不如人意些。

在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准資本主義國家之中，看不到有哪一個國家像毛的國家這樣貧窮、這樣專制、這樣愚昧。

它們的經濟水平持續穩定地提高，從未發生重大「人禍」；不像我們這裡的經濟建設一波三折，「人禍」頻仍。它們的勞動者收入在幾十年裡增長了許多倍，以致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驚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由於生活富裕而喪失了革命鬥志；不像我們這裡的工人工資額和社員工分值在二十年間沒有什麼變化。

它們的政治舞台群星燦爛，並不斷推陳出新；不像我們這裡只准演獨角戲，只有一個大明星，即使他老態已顯、嗓音已啞，也硬是要從頭唱到尾，還不許別人喝倒彩。

它們的大眾傳媒五光十色，不像我們這裡的報紙廣播清湯寡水。前一傳媒要掏老百姓的腰包，故而老百姓願意接受什麼，他們就傳播什麼，使得老百姓接受傳媒信息如同下館子，自己想吃什麼就點什麼；後一傳媒要看其上級的眼色，故而其上級想要宣傳什麼，他們就傳播什麼，使得老百姓讀報聽廣播如同進了公社食堂，大師傅燒什麼就吃什麼，最終不免要吃倒了胃口，吃壞了肚子。

筆者曾聽《人民日報》一位老報人談辦報體會：當老百姓每每愛看我們報紙的時候，就是上級批評我們最多的時候；而當上級屢屢表揚我們報紙的時候，也就是老百姓對我們怨言最多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常常還沒有讀我們報紙就拿它來擦桌子的時候。即使到了今天，這張中國最大的報紙仍然是中

國老百姓私費訂閱最少的報紙。

就中國自身情況看，毛所要搞的「社會主義」，也不如他所反對的「資本主義」。這一比較在農業方面有突出表現。

按毛的說法，農民搞合作化或集體化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分田單幹或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認為，前者比後者有巨大優越性。那麼，實際情況如何呢？

關於毛澤東堅持要走的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實際後果，每個過來的中國人都已看到，前文也已指出：「二十年的路白走了」。套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術語來說，在生產力上，它經過了二十年努力卻未能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在生產關係上，它經過了二十年變革卻又變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大田重新分為小田。

關於搞分田單幹的資本主義道路，雖為毛澤東竭力反對，但仍有積極表現機會。這種機會大體說來有三次：

第一次發生在1950年代初。當時，大規模的內戰剛剛結束，百廢待舉。新中國農民從「土改」中分得土地，採取自耕自種方式，很快就提高了農作物產量，改善了農村經濟狀況，進而加速了戰後國民經濟恢復過程，鞏固了中共新政權。

第二次發生在1960年代初。當時，大規模的饑荒仍在蔓延，餓死人現象隨處可見。安徽省農民為了活下去而搞起了「責任田」、「包產到戶」，並引起其他地區農民效仿，結果也迅速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原先饑荒最重的農村地區，由於搞起「責任田」，反而最先從饑荒中擺脫出來。當年安徽民間就有這樣一種說法：城裡人一月關餉不抵鄉下人一擔青蒜。不管怎麼說，事後被毛澤東斥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責任田」，此次確實緩解了全國性饑荒，救下了許多人的命，對於被毛搞砸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了休養生息的作用。

第三次發生在1970年代末。當時，老人家去世不久，大規模政治動亂也結束不久，整個政治經濟形勢仍未完全脫離「崩潰的邊緣」，大多數老百姓

仍生活在貧困中。安徽省農民再次率先搞起「聯產責任承包制」，又將他們十多年前已經做過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結果仍是「一包就靈」，迅速改善了農村中的經濟面貌，同時促進了城市裡的經濟體制改革。於是乎，「資本主義的分田單幹」竟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立了首功。這是已故老人家始料不及的。

毛澤東曾告誡他的人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可是，當社會主義有了困難時，又見資本主義出來拉它一把。在上述三次重大轉折時期，都是毛竭力反對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救了社會主義的農業，救了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保了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

鑒於這些史實，人們或許可以對上面那句話作些補充：社會主義救中國，資本主義則救社會主義，救那個被毛澤東折騰得死去活來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不只是資本主義拉了社會主義一把，而且社會主義也促了資本主義一下。當然，這種促進不是從正面實施的，而是從反面作出的，即社會主義以自身的失敗來反襯出資本主義的成功。

很有諷刺意義，為在中國搞資本主義提供最充分論證的人，不是那些熱情歌頌資本主義的人，而是那些竭力反對資本主義並致力實踐社會主義的人。因為，他們把社會主義搞砸了，搞得無路可走了，故而把它的反面——資本主義給凸顯出來了，顯得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了，儘管這條路未必就是最美好的。

必須承認，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發展得過頭了，不是衰老得百病纏身了，而是發展得很不足，因而在許多方面仍有著新生事物的氣息，仍有著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這種生命力已在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表現出來。從企業經濟效益上看，除了那些國家壟斷性行業外，國營的（即社會主義性質的）趕不上集體的（即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而集體的又趕不上私營的（即資本主義性質的）。老百姓也有一個類似說法：國營單位是屬豬的，等著餵食；集體單位是屬雞的，走著找食；私營單位則是屬鳥的，飛著找食。目前，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

3/4虧損，社會主義的國家工商稅收有半數以上來自私營企業與集體企業。

如果就此斷定，毛澤東及其黨人從來就不清楚資本主義有一定歷史進步性，從來就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不公平的。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曾指出：「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作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¹。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又重申：「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²

建國以後，劉少奇鄭重表示，執政黨目前任務就是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³

可是，毛澤東一坐穩江山，就改變主意，大食其言，大加限制乃至竭力消除資本主義，同時迫不急待地搞起社會主義，結果只用了二、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原計畫要用十幾年時間來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終於把他的國家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比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多毛病的社會主義國家。

老人家性子也太急了，第一次坐進駕駛室，就開起快車來，結果把車開翻了，開進路邊深溝裡。不過，事情還未結束。前面大個子司機毛澤東心急火燎地開翻了社會主義新跑車，後面不遠處小個子司機鄧小平搖搖晃晃地開來了資本主義大吊車，想去把那輛掉到溝裡的車拉上來。至於這位小個子能不能做成這件大事情已屬後話了。

1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061。

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432-1433。

3 劉少奇，〈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劉少奇文選》，下卷，頁62。

馬克思主義哲學愛講唯物主義的決定論，愛講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毛澤東早先也愛講這些大道理，但坐了江山後就轉而愛講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愛講什麼話都是他說的對，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

然而，有些事情，像整個人之類的事，可由他說了算；還有些事情，像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樣的事，就由不得他說了算。前者只涉及到政治權力的具體運作問題，誰的官大誰說了算；後者則涉及到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問題，不以某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只是站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斷裂帶上，卻硬要去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許多事情；他從沒有到達過資本主義，卻硬要去做必須經過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去做的許多事情；並且，他做得非常堅決、非常固執，碰得頭破血流也要繼續做下去，既把自己害苦了，更把人民害苦了。

毛澤東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立志要做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可是，他所要埋葬的資本主義是他並不了解的生命體，這不能不說是在瞎埋；並且，他所要埋葬的資本主義比他所要搞的社會主義更有生命力，這又不能不說是在活埋。

這被埋下去的活東西，終究是要破土而出的。不過，這重又長出來的新東西，由於已受過埋壓而很可能長得歪七扭八。

文化叢刊

毛澤東執政春秋

2001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單少傑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張怡菁
校對 陳怡君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21-6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